一五一十周刊

NO.122
2013年9月6日

巴森姆•哈达：叙利亚问题的历史根源 | 黄日涵：叙利亚上空的“达摩克斯之剑”

吉迪恩•拉赫曼：为不干预叙利亚辩护 | 陈家喜：国际干预与民主转型：基于“阿拉伯之春”的经验观察



编者的话

8 月 21 日，叙利亚反抗军指责政府军在首都大马士革附近使用化学武器，导致逾千人伤亡，“化武指控”一再升温引发国际社会的强力关注，国际政治、军事、金融领域再次聚焦中东这个遭受过无数次战争洗刷的国家。国内各派在国际各方势力的支持下拉扯着动荡的叙利亚，两年内战进入尴尬的拐点，“阿拉伯之春”在叙利亚没有迎来夏天似乎就一步踏进冬季。

这一切看起来非常复杂：政府军、反抗军、极端势力；美国、俄罗斯、中国；武器、金融、石油；宗教、经济、国际关系，所有界别都与叙利亚扯得上关系，每一方都能在这场混战中发声致辞。反对派不仅能获得美国的青睐，还能从基地组织得到支持；政府军受到俄罗斯的恩惠，驰骋叙利亚 40 年的阿萨德家族更有笼络黎巴嫩真主党民兵等援军的实力；奥巴马强硬表示“已经决定应该采取不派驻地面部队的有限军事行动”话音刚落，普京对西方计划单方面动武行为的警告便充斥媒体。除却 200 万逃离家园难民，似乎谁都在为叙利亚出谋划策。

本期一五一十周刊，我们在尝试梳理错综复杂的叙利亚内战起因的同时，也试图一探国际干预这一话题：干预是否正当？是否可能？影响如何？

国际干预的概念古来有之，今天它似乎已成为解决国家/地区矛盾的一剂“常用药”：“联合国军”之于朝鲜半岛、“华约”之于捷克、“北约”之于科索沃，卢旺达惨剧更令国际社会后怕，“萨达姆模式”、“卡扎菲模式”等等新干预模式层出不穷。现在，“化学武器”当前，“干预”的必要性更彻底压过人们对于后果的担忧。

冲突的背后固然包藏着不舍得放弃的大国利益，手持人道主义大旗的人们似乎也占领着不明不白的道德高地。对风险的保护刺激人们甘愿冒险，阿兰·库普曼称之为“道德危害问题”，因为科索沃而威胁对塞尔维亚使用武力的声明使得科索沃解放军胆子更大，鼓励了士兵使用暴力伤害在科索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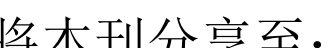
塞尔维亚平民，从而激怒塞族人做出过度反应，招致外国干涉。那些反对独裁者比如叙利亚的阿萨德的人已经使用或正在使用同样的伎俩。“国际干预”动机，犹如战争何以爆发一般变得扑朔迷离。

无论如何，截至9月5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已经通过决议案，授权总统奥巴马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军事介入叙利亚木已成舟。在经历了索马里、伊拉克、利比亚之后，“国际干预”这味药是否能挽救叙利亚于水火？亦或将其推入更深的漩涡?

1510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周刊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状】

9-1 叙利亚内战大事记

2011 年 1 月 1 日 受到世界金融危机波及下，叙利亚在阿萨德家族和复兴社会党 40 多年集权统治压力下经济、政治、宗教等矛盾陆续井喷，民间爆发示威游行等和平抗争，规模渐涨并波及全国。叙政府的铁血镇压导致大规模平民伤亡，遭到世界普遍谴责。

2011 年 7 月 29 日 残酷镇压引发军队内部强烈不满，原政府军上校利亚德成立“自由叙利亚军”，各类反政府组织相继而出。

2012 年 7 月 15 日 政府军大量倒戈和民众频繁起义，以自由军为主的反抗军不断壮大。政府军大片地区失守，包括第一大城市阿勒颇在内多个重镇失守。期间反抗军挑起首次大规模武装行动“大马士革火山与叙利亚地震”战役，被认为是叙利亚内战的起点。

2013 年 3 月 反抗军占领省会城市拉卡城，并基本瓦解政府军在东线的防御。其后自由军创始人利亚德被暗杀受伤，自由军援助受国际武器全面禁运影响，反抗军中极端组织抬头。政府方面则向俄提出的武器需求，引入外国武装参战，并组建国防守卫队新民兵组织，在霍姆斯、大马士革等局部反攻取得一定成效。

2013 年 4 月 政府军攻占古塞尔，高调宣传并公开承认引入黎真主党参战，引起国际社会震动。海合会、阿盟等国重启对自由军援助，欧美开始考虑对自由军支援，反对派政治和军事领导层全面改组，自由军展开整编，在全国范围发起较大攻势。

2013 年 8 月 叙利亚反抗军称政府军在使用化学武器进行攻击致逾千人伤亡，引起西方社会反弹。联合国调查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真相小组赴大马士革调查化学武器的情况。9 月 2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叙利亚发出措词强硬的讲话，称已经决定应该采取不派驻地面部队的有限军事行动。

【叙利亚 123】

政府军阵营

1.政府军：战前含陆、海、空军和内卫部队、民兵等，总兵力 42.4 万人。其中为内战主力的陆军野战、内卫部队和民兵约 23 万人。内战爆发后兵力下降 50%以上。

2.伊朗招募的雇佣军（含伊朗革命卫队、伊拉克民兵等）：约 1.8 万人。



3.黎巴嫩真主党民兵：经战损还剩约 0.4 万-0.6 万人。

反抗军阵营

1.自由叙利亚军（The Free Syrian Army）：约 7 万人。为世俗民主派。

2.胜利阵线（Jabhat Al Nusra）：约 0.6 万人。主要为叙利亚人，倾向极端宗教，曾效忠基地组织但后分裂。与自由军联合作战但不受调遣。

3. Islamic AhrarSham 运动组织：约 1 万人。倾向极端宗教，主要分布于伊德利卜、哈马和阿勒颇。

4.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ham：约 0.5 万人，多为外籍人员。来自伊拉克的基地组织分支。胜利阵线与基地组织分裂后，其被派入叙作战。倾向极端宗教，常与自由军和胜利阵线等发生冲突。

阿萨德家族

阿萨德家族利用阿拉维派这一少数派，统治着占国民大多数的逊尼派民众达 40 多年，是阿拉伯地区唯一成功将权力移交给下一代的独裁统治家族，被称为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传奇。现任总统巴沙尔是叙利亚已故总统阿萨德的次子，在巴沙尔的领导下，叙利亚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宽松治理。成千的政治犯被释放，实施了一些放宽媒体限制的暂时措施，也开放了集会自由，这项改革当时被称为“大马士革之春”。但改革步伐缓慢，在保守派势力的干涉下，巴沙尔渐渐向旧式“铁腕”治理妥协，从推行改革走向武力镇压。



9-2 叙利亚“毒气屠杀”：难拆的全球定时炸弹

作者：腾讯评论。

“

如果确定叙利亚使用了化学武器，美国政府会改变现在的策略，介入叙利亚内战。这也是为何这次的“毒气事件”如此受到瞩目的原因，如果属实，这就是一场化学武器引发的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也可能是外部社会介入叙利亚内战的开始。那么，叙利亚内战的转折点很可能就此而来。

”

导语：

叙利亚反对派指责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造成包括平民在内的大量人员伤亡。消息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和担心。叙利亚的化学武器问题对国际社会到底有何影响呢？

一、“毒气大屠杀”尚是罗生门，但是叙有化学武器被国际社会公认

1、遇害人员看着有“中毒”表征，不过细节未认定，叙利亚政府军和反对派互相指责

一具具尸体横趴在地上，看不到明显的伤口；猫也死了；幸存的孩子呕吐不止……这是由英国独立记者拍摄的一段视频。不管是录像还是目击者的讲述，都直指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部郊区发生过袭击事件，遇袭者的症状也的确像是中了“毒气”。叙利亚反对派声称有 1300 人遇难。然而，总部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统计的死亡人数暂时为 130 人。该组织以精确统计平民死亡人数而著称。同样统计了死亡人数的还有叙利亚暴行档案中心，该机构的官网上列出了遇害人员的姓名、是否成年、遇害地点、遇害原因，根据记录，起码当天有 500 人在大马士革郊区遇害，而该机构直接把遇害原因归结为“化学武器”。



另一边厢，叙利亚政府军则暗示反对派对其使用毒气。叙利亚国家电视台也在周六发布了一段视频：政府军士兵在大马士革和反对派交火，突然发生严重呼吸困难。这样一段视频被看作是在暗示反对派武装使用了化学武器攻打政府军。

尽管死亡人数和具体死亡原因未定，但是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在大马士革的郊区的确发生了规模不小的死亡事件，从症状看，和化学武器有相似性。不过是不是化学武器有待核查，因为视频中救助伤者的人员没有穿戴任何的防护设备和器具，不合常理。另外，联合国派出的调查组正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他们的任务就是核查叙利亚内战中是否使用过化学武器。这个时机被认为太过蹊跷，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方面不太可能选择这时候“引火烧身”。而反对派则被认为有可能造假来吸引国际社会的介入，不过，一般又都认为化学武器都在阿萨德政权的控制之下，反对派不太可能获得。

2、但是叙利亚政府持有化学武器基本为国际社会公认，且可能已经在内战中使用过

去年 7 月，叙利亚政府发言人曾经说，叙政府永远不会用化学武器或非常规武器对付叙利亚人民，只会用来抵抗外国侵略。这被普遍解读为叙利亚政府首次承认拥有化学武器。虽然随后叙利亚官方又否认了这一说法，表示这是假设性语言。但是，今年 6 月，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也证实了叙利亚拥有化学武器。该报告称，叙利亚政府拥有化学武器，并且可能已经使用过。不过该报告并没有确认该化学武器究竟是哪种毒气。同时，也没有排除叙利亚反对派也有获得化学武器的可能性。

而美国的情报机构也确认了叙利亚内战中曾经使用过毒气。据透露，他们从一死一伤两名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分子头发等样本上提取到了沙林毒气残留。而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声明是，“鉴于我们获得了多方面的独立信息，我们的情报机构对这个评估结果非常有信心。”

事实上，叙利亚政府持有化学武器一直就被认为是“国际社会公开的秘密”。有情报称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叙利亚政府就拥有芥子气、沙林毒气等各类化学武器共计数百吨。叙利亚也是少有的几个未签署《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国家之一。

二、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被认为是国际社会“定时炸弹”

1、倘若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对全球都是灾难性的

叙利亚的化学武器目前应该还处于阿萨德政权的有效控制之下，有多处储存地。而反对派要获得这些化学武器比较困难，并且反对派可能也缺乏运输设备。

以色列等国家担心阿萨德政权会用化学武器攻击自己。不过，国际社会最大的担心其实是，倘若这些化学武器流入黑市或者不慎落入恐怖分子之手，对全球来说都是灾难性



的。化学武器的工作原理是，利用具有毒性的化学物质致使敌人大规模地死亡或者受伤。而许多毒气都被称之为“无形杀手”，无色无味，很难被发觉。恐怖分子利用化学武器攻击平民早有先例，1995年，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使用沙林毒气，造成13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不幸中的万幸是该邪教组织还没拥有提纯沙林毒气的设备、技术，否则后果难以估计。

2、叙利亚的乱局下，这种恶果发生的可能性激增

目前的叙利亚，大局上看是反对派和阿萨德政权的对峙，可倘若细分了看，教派林立、各种势力复杂得令人咋舌。许多极端主义分子也来到叙利亚聚集。有反恐情报称，已经有6000多名好战的极端主义武装分子涌入了叙利亚。而英国媒体《每日电讯报》早前报道，4月，叙利亚政权的一座主要化学武器工厂附近爆发了一场争夺战，发起争夺行动的是宣誓效忠“基地”组织的叙利亚反对派“胜利阵线”。该工厂生产致命的沙林毒气。该报道称，沙林毒气比氰化物要毒500倍，要不了多少，恐怖分子就可以在伦敦或者纽约的地铁中引发灾难性后果。

当然，也有专家说大量的化学武器难以掩人耳目地进行运送，并且还需要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将不同的原料混合起来才能成致命的制剂。因此，认为国际社会是杞人忧天。但无论如何，不可否认，恐怖分子拥有大量的化学武器对国际社会都是坏消息，可能引起的恐慌是巨大的。

三、可要拆除这个“定时炸弹”不容易，国际社会左右两难

1、一方面，国际社会都强烈反对叙使用化学武器，奥巴马曾把这设为美国是否介入的红线

倘若阿萨德政权使用化学武器，无疑会引发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有分析称，阿萨德政权在两小时内就可以完成化学武器的空投，届时，包括美军在内的外部力量根本来不及反应。

因此，奥巴马将化学武器设为“红线”。 去年8月2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警告说，叙利亚政府只要使用化学武器，甚至只是“移动”它们，就将触及美国的“红线”。后来，奥巴马又说，“我已经明确说过，一旦使用化学武器的事实得到确认，这件事就会成为一个变盘因素(Game Changer)。”这可以理解为，如果确定叙利亚使用了化学武器，美国政府会改变现在的策略，介入叙利亚内战。



这也是为何这次的“毒气事件”如此受到瞩目的原因，如果属实，这就是一场化学武器引发的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也可能是外部社会介入叙利亚内战的开始。那么，叙利亚内战的转折点很可能就此而来。

2、另一方面，局势太复杂，国际社会的介入成本非常高，因此犹豫不决

严格算起来，奥巴马的“红线论”已经失信过一次。美国的情报机构实际上已经确认了叙利亚政府军小规模使用过化学武器。也就是说，不管国际社会有没有定论，美国自己是有结论的。但是，美国的应对是准备给反对派提供武器。但据报道，到目前还没有任何武器运达。因为，美国实际上支持的是反对派中的温和派，而不是那些极端主义分子，恐怕也有武器落入后者之手的担心。而就算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俄罗斯，在反对极端主义者的立场上也和美国等国家一致。

另一方面，叙利亚的未来是什么？再理想主义的人恐怕也很难乐观起来。叙利亚不可能走埃及模式——阿萨德不是穆巴拉克，政府军队处于阿萨德政权的控制下；也不可能走也门模式——“和平”地流放总统，因为阿萨德手上的血债太多，和解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且他也不可能放弃，而支持该政权的俄罗斯也不可能放弃自己在中东的传统势力范围；最后，还是不可能走利比亚之路，阿萨德政权自身的实力要比卡扎菲强很多，虽然现在分析都认为阿萨德无力统一，但事实上其已经差不多演变为叙利亚力量最大的一个“割据军阀”。如果国际社会要介入，绝不是设置禁飞区，出动空军这么简单。而一旦介入，就可能被拖入到泥潭之中，中止内战就得花费巨大的代价，更不用说后期的教派和解、重建国家工作，这不会比重建一个伊拉克容易一丝一毫。

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的“毒气屠杀”传闻发生后，美国政府很快就召开了会议讨论对策，可介入派和不介入派依然分歧巨大，难以达成共识。一般都认为，要么就彻底不管，要么就一管到底。可国际社会彻底不管，那么发展下去，叙利亚可能变成一个军阀、极端主义者等分裂主宰的动荡之国。成为中东地区最不安定的因素、恐怖主义的温床。而叙利亚被认为处于中东的“心脏”，动乱的叙利亚对于全球的能源安全等问题都没有好处，甚至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同时，在战火不断之下，难保阿萨德政权没有能力妥善地保管这些化学武器，那么化学武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也是极有可能的。如果介入的话，要让各方达成和解，建设一个统一、和谐的叙利亚实在有点天方夜谭。因为历史、宗教等因素就决定各方面很难超越自己的立场，有一个统一的价值观、追求。

说到底，叙利亚的裂痕正在越来越深，随之而来，死伤的平民越来也多，被迫流离失所的难民也越来越多。联合国今年 6 月的报告就显示，不管是政府军还是反对派，都犯下了人道主义罪行。



结语

“毒气大屠杀”传言让许多人也展望叙利亚内战会不会引来转折点。可目前看来，还是困局无解。这样的胶着状态对叙利亚平民的伤害只会越来越深，而不仅是“毒气”问题威胁全球，一个新的中东“火药桶”也是国际社会的一颗定时炸弹。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9-3 巴森姆·哈达：叙利亚问题的历史根源

> **叙利亚危机不能被简单的看成正反的对立，阶级、教派、地缘政治、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战略在一起促成了这场没有出路的动乱。**

巴森姆·哈达：乔治敦大学当代阿拉伯研究中心研究员。

关于阿拉伯之春的起因已经有很多说法了，但很少人有人关注政治和经济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历史渊源。

从 2010 年 12 月阿拉伯的革命从突尼斯开始时，就有人对比过叙利亚和突尼斯的经济状况，也有人归因于长久以来的集权统治，但这并不能说明为什么这场革命在此时发生，“社交媒体革命”的角度更模糊了真正的原因。

通过对 2011 年一系列事件更细致的分析，宗派和教派冲突理论一时很流行，但过去这些人却能够相处。后来还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叙利亚是“抵抗帝国主义”的前沿。我承认地缘政治和外部干预的确会对叙利亚国内局势产生影响，但不应该和国内问题搅在一起。

叙利亚危机不能被简单的看成正反的对立，阶级、教派、地缘政治、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战略在一起促成了这场没有出路的动乱。

我之所以称其为危机而非动乱是因为，我并不确定现在整个地区发生的变化。有些政权易主了像突尼斯和埃及，但是不意味着会带来抗议者希望的结果。而像叙利亚政权，他其实仍有支持者。

经过一年的动荡之后，我们看到的抗议，已经受到欺压的，不满的群众自发的运动。现在是中长期的，有策略的对抗，参与者包括海湾国家、土耳其以及所有想在地区内发挥更重要作用的国家。

一个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所共有的特征就是大规模的人员流动，这是自殖民时代结束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众之间的信息交流造成了整个区域的多米诺效应。这就是说，即使



各国民众之间只有无形的，历史的，文化的以及政治上的联系，但阿拉伯人还是一个整体。

我们不应该把这个地区所有的抗议单独的分析。但每个国家不同的政治经济，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了不同的走势。

另外认清在这个区域内和区域外其他国家发生的情况也很重要，个别国家间组成的联盟的影响力，以及国际利益决定着干涉和压力的本质和程度。

美国支持的沙特军队前往巴林平息当地的局势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这与巴林及其邻国，以及其他非阿拉伯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有关。外部对平息叙利亚局势的考量也是同理，但在政治的考量多于经济上的。

过去一年中对于腐败的愤怒不仅仅引起了中东地区的抗议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来民众的愤怒，包括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在过去数十年政治和经济精英在面对民众暴动过程中不断加深的关系是我想讨论的。这种权钱结合在全球的政治经济界盛行，但在不同背景下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在很多阿拉伯国家，私有化进程是与其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最为相关的，但单这一方面并不是造成危机的原因。

要全面的衡量权钱结合的影响力并不容易，因为这需要将现有的政治、社会，以及经济领域出现的病症一一分析：两极分化、贫困、镇压以及最终的爆发，千头万绪，以至于很多人图省事用文化来解释这一切。

但实际上，可以做到的是强调那些因为新精英主义、应对模式、抵抗、政府管理和生活标准而加剧的问题。

乍看起来，我们可以将权钱组合的影响分为至少两个方面，这两方面对 2011 年春天所发生的事有直接或者间接的作用。

从政治上讲，不管有没有其他因素的作用，过去数十年这种政治精英和财富精英的组合似乎为威权统治提供了支撑。

它能使现状合法化，因为这种结合的产物就是包括各种形式的“自由化”以及“国退民进”。由此带来的社会变化，我们可以用“萌芽”，“增长”，或者“活跃”来形容，这被认为是政治“开放”，并由破除垄断而带来的经济环境“自由”。

这种变化还可以是“私有”领域的所谓增长，但这是建立在伤害国营的“公有”领域的基础上，让更多的人接触到资源被认为是经济民主化的表现。



这种变化让外人看来很是欣喜，包括那些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的“国际社会”，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对于在 2004 到 2010 年的经济增长计划就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人口的绝大多数，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挣扎的人，并不认为以上是好的变化，因为补贴、就业和福利都在明显下降。

这种权钱结合的社会影响在 2011 年之前已经非常明显了。经济改革导致社会安全网（福利、补贴和就业）的摧毁，但这张网过去一直在支撑市场失灵带来的贫困。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实行以来，基本的医疗和教育都受到了影响。中东地区中低收入人群一直依靠补贴才能买上生活必需品，这种补贴包括小麦、面粉、糖和油。

从有到无的变化导致了两种危险的情况发生，一种是贫困（极端贫困）和两极分化，中产阶级越来越少，另外一种就是从“市场”中被排除出去，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未被记录在案的经济活动异常活跃。

埃及学者指出无论是世俗主义者还是伊斯兰主义者，对于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的支持都还在继续着，在革命之后依然如此。对于涓滴效应、紧缩预算、私有领域增长、自力更生和结束“大锅饭”的设想依然存在。

我不是不同意这样的设想，但这样的理论需要经过检验。我想说的是，还有别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但很少有人提及，因为那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进行再分配。

新精英主义以及其他政治和经济政策带来的另外一个明显的结果就是，在私营及国营领域工人阶层的利益的增长——其实没有什么增长。

从工人到商人，这一阶层力量的变化也是国有经济改革的一部分。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开始权力、规则、法律逐渐从为工人服务转向为商人服务。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的商会、农民联盟和工会逐渐由政府指派的人领导，但仍享受一些特权。

政治精英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为这一变化而做打算，但近几年的变化有新的特征。早前剥夺工人权利被看作是威权政治的专横，是有违“道德契约”的，但现在这被称作是“投资”和“增长”。

叙利亚的意识形态背景是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这是所有判断、标准、意识形态、宣传用语的基础，因此社会两极分化、贫困、落后被认为是“错的”和不可接受的。而今，这些后果成了新的标准，那就是“更好的”未来，这些都是通向富裕和高效率的必经之路，但被动乱打乱了，但并不意味着这种“零和”的发展方式就被遗弃了。

可能从社会经济学角度出发，由新精英主义带来的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大肆强调城市的发展（以农村和生产为代价），以及非生产性的经济活动，主要就是消费。旅游业和服务

业的增长是以制造业和农业为代价的（和土地改革以及其他法律相关），这种增长为社会带来了不同的需要。比如说对于技术工人的需要明显减少，同时用来培育技术工人的教育以及培训系统也随着衰弱。

无论是任何在“新经济”政策下发展起来的领域，包括信息技术，实际上都是比其他国家远远落后的。他们太小了，无法替代其他领域的贡献，更不用说拿去国际上竞争。

这意味着每年成千上万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如果这种公共政策继续被新精英主义占据着，不管威权政府还是新成立的政府。

2011 年春天所发生的事情与这场私有化改革的失败脱不开干系。无论是从民众的满意度还是从可持续增长的角度。

因此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更有想象力的发展方式，能够发挥私营和国营优势，同时改善不同领域和地区的利益分配（比如工业、贸易、旅游业、服务业、信息技术产业以及农业， 城市和农村之间）。

如果将现在的革命或者抗议的起因分门别类、对号入座成私营领域投资、外国直接投资、新市场机构、新法令新法规、法制的做法显然是错的，但如果不从这些角度去分析，那么就很难充分理解这场动乱的深度、广度和烈度。

发展不仅仅是规则或者市场的问题，也不可能轻易解决。那些严重的偏差是从各种各样的持续的政治以及经济失衡中来的，是从对独立自主道路的否定中来的，包括个人的以及集体的。新的权钱结合放大了这些问题，如果不另寻出路，只会继续恶化。

权钱结合本身不足以导致持续的示威抗议。只有多项因素结合才能终止看似无法突破的恐惧。这些因素从结构上看一点也不严苛：政治和战略以及个人的考量最终扮演了重要角色，颠覆了平衡，出现不可想象的结果：叙利亚的示威抗议。

换句话说，在叙利亚的权钱结合带来的经济衰退之外，我们可以发现两个主要因素：一是专制统治，二是示范效果。经济严重衰退，精英控制公共政策，专制统治不能得到有效的修正。

多年来，这些因素产生了一种高压锅效应，导致众多国民出现绝望情绪，受到影响的不止人们的基本生活以及政治自由的需求。更深入地观察这种局势，就会发现这些因素还深深地打击了人们的尊严。我认为，即使这种结果（人们的尊严受到威胁）也不足以在某些国家造成大规模动乱，尤其是叙利亚。叙利亚抗议示威爆发的原因是，人们觉得，现在，在突尼斯和埃及之后，人们也可以实实在在地为此做点什么了。



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因素下，在人们的尊严受到伤害的情况下，还是需要一些策略性的准则或推动因素，激发大规模的动乱。许多观察者问，人们为什么愿意牺牲自己生命，而且前赴后继，尤其是在叙利亚？完全是因为长期来人们遭受的伤害，伴随着寻找一条出路的希望。

然而，一些国家出现这种变化的时机不那么成熟，人们的不满并没有那么强烈，社会机制也不允许立即挑战或改变现状。叙利亚就是一个合适的例子，也门也勉强符合。

时机成熟在这里意味着，我们所讨论的伤害以及更好选择的可能性还没能深入社会各阶层或各地区的核心。因此，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也就相对平静。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疑】

9-4 黄日涵：叙利亚上空的“达摩克斯之剑”


黄日涵：中国国际关系学院助理研究员。

“

由此不难看出在叙利亚问题上，大国之间基于不同的立场以及国家利益，所持观点和态度不尽相同。在叙利亚问题上，大国之间背后的政治博弈，实际上将最终决定叙利亚问题的走向。

”

据外媒报道，9 月 1 日，美国国防部官员称，美国核动力驱动航母“尼米兹号”以及其他美军船只组成的舰队现在已经向红海出发，在必要情况下，将协助美军对叙利亚的“有限军事打击”。据报道，“尼米兹号”航母舰队包括 4 艘驱逐舰以及一艘巡洋舰。

叙利亚局势已连续动荡 3 年

叙利亚局势动荡加剧，这场动荡起源于 2011 年 3 月的叙利亚危机，当时德拉市警察逮捕涂写反政府标语的几名小学生。随后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叙利亚民众的抗议示威活动逐步升级，最终演变成为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之间的暴力冲突。

截至 2013 年 7 月叙利亚冲突死亡人数已经超过 10 万人，然而旷日持久的对抗似乎并没有终结的迹象。对于巴沙尔而言，他已经无路可退，唯有坚持，否则阿拉维派将万劫不复。换而言之，巴沙尔和反对派之间几乎没有妥协的可能性，这其中更深一层的原因还在于伊斯兰内部教派之间的矛盾。

以巴沙尔为代表的阿拉维派是什叶派、萨满教的混合体，可以勉强称之为什叶派。阿拉维派的组成人员过去社会地位都比较低下，在上世纪曾经长期受到逊尼派的欺压。二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以什叶派为代表的阿拉维派取得了政权，由于长期的积怨使得什叶派和逊尼派在叙利亚内部的矛盾更加凸显。除此之外，在叙利亚内部还蕴含着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之间的矛盾。



复杂矛盾结合体的叙利亚，使得危机持续加深，僵局难以打破。今年 8 月 21 日叙利亚反对派指责政府军使用含有沙林毒气的火箭弹对大马士革郊区姑塔东区进行袭击，造成上千人死亡，但很快叙利亚政府对此予以否认。

这一事件对本已经动荡不安的叙利亚局势来说，更是“火上浇油”，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根据本国情报部门的信息，认定是叙利亚政府军使用了化学武器。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计划军事打击叙利亚，一时间，叙利亚问题成为了全球舆论的“暴风眼”。

美国无视国际法基本原则

为了调查清楚化学武器问题，联合国调查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真相小组前几天已经进驻叙利亚，就此前阿勒颇省坎阿萨镇等三起使用化学武器传闻进行调查，特别是 8 月 21 日大马士革姑塔地区发生的使用化学武器事件。

8 月 30 日，调查组已完成样本和证据收集工作，离开叙利亚前往“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部所在地海牙，然后把样本送往欧洲一些指定的实验室进行分析。据悉大概需要 2 周至 3 周的时间出分析报告，并最终由联合国秘书长转交给安理会和所有联合国会员国。

从这个进度来说，美国还需要 2 周至 3 周的时间才有机会从联合国得到答案，但目前美国明显已经等不及了。美国白宫 8 月 31 日正式向国会提交了一项决议草案，要求授权对叙利亚政府目标采取军事行动，以回应其所声称的叙利亚政府在冲突中使用了化学武器。众议院议长博纳表示，他将在国会 9 月 9 日复会后安排众院讨论对叙利亚动武的议案。

奥巴马请求国会授权的这一做法，叙利亚反对派表示失望。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奥巴马受到来自国内民意、美国国会以及国际舆论的多重压力。由于武力打击叙利亚风险难测，奥巴马向国会寻求支持，无疑是为了增加自己最终对叙利亚动武的“底气”。

虽然美国已经下定决心，但如果美国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将违反国际法原则。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七项基本原则中更是明确规定：各会员国应该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各会员国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以不符合联合国宗旨的任何方式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因此，如果美国绕开联合国，寻找借口单方面打击叙利亚也将再一次粗暴地践踏国际法，这一做法也将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

中俄不赞成美国对叙利亚动武



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英国这次在关键时刻却掉了链子。英国国会下议院 8 月 29 日投票否决了首相卡梅伦提出的对叙利亚局势进行军事干预的动议。卡梅伦无奈表示尊重该项决定。

法国是中东地区老牌宗主国，曾统治叙利亚 20 多年，此次甘当“急先锋”主要还是出于地缘政治利益考虑。法国总统奥朗德 8 月 30 日明确表示，法国将与美国一道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成为西方盟国中唯一支持美国动武的国家。

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和俄罗斯一直都不赞成对叙利亚动武，在近期愈演愈烈的危机中，中俄也是积极协调各方势力。俄罗斯一直将叙利亚看作是其“后院”，地缘战略意义不言而喻，俄罗斯在叙利亚还建有独联体之外唯一的海军基地——塔尔图斯港。因此，俄罗斯不可能坐视不管，据俄罗斯方面消息，目前俄罗斯一艘导弹巡洋舰和一艘反潜舰将在近期抵达东地中海。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要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来处理叙利亚问题。与此同时叙利亚对于中国来说同样具有特殊的意义。在 2011 年，中国与叙利亚双边贸易额达到 30 亿美元，叙利亚对中国的出口主要是石油。目前，中国在叙利亚的中资企业有 20 多家，其中包括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国有企业。如今中国 58%的进口石油来自中东地区，预计到 2015 年，这个比例有可能上升至 70%。因此，叙利亚对于中国能源安全来说异常重要，此外中国也希望通过叙利亚问题的处理在国际社会体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以及扩大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由此不难看出在叙利亚问题上，大国之间基于不同的立场以及国家利益，所持观点和态度不尽相同。在叙利亚问题上，大国之间背后的政治博弈，实际上将最终决定叙利亚问题的走向。

各派势力博弈决定叙利亚未来

综合多方面因素分析来看，在美国国会授权之前，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不大。短期内叙利亚危机很大程度上将是“茶杯里的风波”掀不起什么大浪。一方面美国目前没有叙利亚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的明显证据，加上俄罗斯和中国的反对，联合国安理会不可能通过授权军事打击叙利亚的决议，如果美国和其盟国要在联合国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强行动武，阻力极大。

另一方面，在埃及政治局势出现混乱和逆转的情况下，美国此时发动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将面临极大的风险。美国更是担心直接军事卷入叙利亚，这将让它陷入泥潭无法自拔。



虽然如此，美国此次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管最终联合国调查报告结果如何，只要美国国会给予授权，美国将会想方设法地找到理由，为武力打击叙利亚找到合适的借口。

其实军事打击行动只能为叙利亚内乱制造新的麻烦，并不益于叙利亚问题的解决，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叙利亚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

叙利亚的未来会怎样，主要还取决于各派势力的博弈。美国将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变量，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现在“前怕狼后怕虎”，既担忧叙利亚内战持续时间过长破坏中东地区稳定，影响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以及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又担心过多的军事干涉导致美国重蹈伊拉克战争的覆辙。

因此，美国人在叙利亚打的小算盘首先是尽可能将伊斯兰极端势力排除在外，在这基础上大力扶持温和的世俗的叙利亚反对派力量。对叙利亚采取“以拖待变”的措施，使巴沙尔政权最终垮台。

如今的巴沙尔政权已经岌岌可危，如果没有有效的改革，不能凝聚国内民心，即使暂时维持住，也只是昙花一现。对于目前的叙利亚局势而言，战或不战，都将继续牵动全球的目光，然而中东和平之路，却依然任重而道远。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9-5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美国该对叙利亚做什么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

> “叙利亚内战既是一场狂热的教派冲突，又是一场激烈的国内族群冲突。叙利亚在该地区的对手则从外部对这场冲突予以推波助澜，而它的这些对手反过来又受益于几个相互对立的大国的支持。这意味着，这场冲突趋于恶化的可能性很大，冲突所波及的地域有可能迅速扩大，暴力程度也有可能急剧升级。”

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的部队很可能对其叙利亚同胞犯下了有违道德的滔天罪行，这为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首先，他可动员全球舆论，抨击叙利亚日益具有毁灭性的教派战争；其次，他可推动更多国家参与到一项更为全面的努力中，防止整个中东地区爆发冲突。

内战总是很残酷的。叙利亚内战既是一场狂热的教派冲突，又是一场激烈的国内族群冲突。叙利亚在该地区的对手则从外部对这场冲突予以推波助澜，而它的这些对手反过来又受益于几个相互对立的大国的支持。这意味着，这场冲突趋于恶化的可能性很大，冲突所波及的地域有可能迅速扩大，暴力程度也有可能急剧升级。

因此，在叙利亚平民遭到异常残暴的化学武器攻击后对施暴方采取的惩罚性措施，理应成为一项更宏大战略的一部分。该战略有两个目标，一是动员全球舆论、谴责这场战争本身；二是催生一个更广泛的国家联盟——这些国家在避免整个地区爆发冲突方面均拥有重大切身利益。

有人辩称，把这个问题拿到联合国(UN)去讨论可能会被某些国家否决，在联合国大会(UN General Assembly)中赢得的支持或许也很有限。这一评估是明智的，但结论却是错误的。现阶段应该采取的举措很简单：只需请求联大支持一项决议，即明确谴责向平民发起



化学武器攻击，将之列为人类文明所不能容忍的行径——但在目前这个阶段并不在决议中指出谁是施暴者。有哪个国家——无论其持何种地缘政治或宗教取向——能拒绝站出来与其他国家一道谴责这种用现代武器发射的化学制剂大规模屠杀平民的、没有人性的做法？

这种效果的投票表决将阐明并凸显出这场悲剧性冲突的道德影响。这场冲突如何产生、支持者是谁、冲突如何变得日益残酷等问题，可在合适的时候予以解决。当务之急是，全人类通过联合国一道采取行动，毫不含糊地谴责这种可怕行径当中隐藏的道德恶魔。

除了展开惩罚性军事行动并把这场屠杀列为十恶不赦的罪行之外，美国还应抓住机会推动更多国家参与到一项迫切的努力中，防止整个中东地区爆发冲突。如果冲突扩散到整个地区，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后果。不少观察人士已经指出，叙利亚的教派内战可能会升级为地区动乱，把约旦、黎巴嫩、伊拉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土耳其以及库尔德斯坦卷进来，最终还会把伊朗和美国卷进来。

俄罗斯可能也会以某种形式被卷入到不断升级的地区暴力中，尤其是在伊朗与美国将要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此外，暴力有可能蔓延到俄罗斯的高加索地区。（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计划中的索契冬奥会(Sochi Winter Olympics)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

主要亚洲国家可能受到的经济影响要严重得多，因为这些国家对中东石油的稳定供应有着很强的依赖。中东石油供应出现任何中断，都将对全球经济形成冲击。在最糟糕的情形下，叙利亚危机可能会让你想起一个世纪前塞尔维亚那场起初毫不起眼的暴力冲突。

所以，愈演愈烈的叙利亚危机要求国际社会作出更广泛的回应，即便不明确解开、也要在暗中解开以下四项因素之间的动态联系：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暴力冲突，以色列压制巴勒斯坦人躁动情绪的行为所蕴含的、不断加剧的风险，伊朗复杂政治的内部和外部模糊性，以及土耳其对西式民主的认同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迄今为止，土耳其似乎仍坚定认同西式民主）。

美国应该带头作出回应，因为其他任何国家都做不到这点。但美国也需要其他方面的支持，这里指的不仅是来自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历史上的中东殖民大国的支持，欧盟也必须加强参与力度。

此外，此时推动可能受到直接影响的亚洲大国——尤其是中国、印度和日本——参与到这一努力中，时机已相当成熟。吸收这些国家加入到更加活跃的外交努力中，可促使俄罗斯放弃中东若爆发危机或会给美国利益造成最大损害的想法，转而与其他有强烈兴趣支持若干相互作用的逐步和解的国家结成联盟。这些和解包括：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下在叙利



亚实现停火，严肃认真的以巴谈判（目前主要由美国支撑），探索与民选的伊朗新政府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从而结束与伊朗之间的相互妖魔化。

这一切都不可能迅速实现。但如果走其他道路，前景必然是暗淡的。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9-6 吉迪恩•拉赫曼：为不干预叙利亚辩护



吉迪恩•拉赫曼：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

对于任何外部干预，关键问题不仅在于能否阻止杀戮，还在于能否决定性地扭转局面，有利于达成一个和平、可持续的政治解决方案。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发生，外国干预只能加剧冲突。

”

玛丽•科尔文(Marie Colvin)在叙利亚霍姆斯(Homs)接受采访时说：“这里没有人能理解国际社会怎么能坐视不管。”第二天，她就在一场轰炸中牺牲。

科尔文是一位勇敢的战地记者，她明确指出了国际政治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两难抉择：国际社会到底有没有义务进行干预，以避免大规模平民伤亡？

近距离目睹这种惨剧的人们往往会作出与科尔文一样的反应。几乎每一位我认识的报道过波斯尼亚战争的记者，都成了外部干预的坚定支持者。这是人性的本能反应。你日复一日地看到无辜的人被屠杀。你知道，不少国家都有庞大的军用储备，可以彻底击溃施暴者。若不去奔走呼号，制止杀戮，似乎既不可能，也不道德。我在走访印度尼西亚占领时期的东帝汶时，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也作出了类似的反应。

冒着生命危险揭露大规模暴行的人权工作者和记者，扮演着重要而值得尊敬的角色。但那些安全地坐在万里之外的办公室里、需要权衡该如何应对的官员和政治人物，虽没那么出彩，但也同样重要，同样值得尊敬。

他们的职责是在主张干预的人道主义冲动和思考后果的公共义务之间进行平衡。他们不仅要问“我们能不能阻止杀戮？”还要问“之后会发生什么？”他们还必须追问：“有没有可能，我们在实施干涉阻止一场恶行的同时，埋下了未来一场更残暴恶行的种子？”这个问题不会招人待见。因为那些主张干预的人笃信道德绝对主义，而犹豫不决者则是道德相对主义者——他们需要在一件恶行和另一件恶行之间进行权衡，因此不可避免地会闪烁其词，听上去冷酷无情。但是如果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由此造成的死亡，可能会比挽救的生命更多。



叙利亚当前的冲突以一种尖锐的形式提出了这些难题。随着屠杀日益升级，“国际社会”的反应看上去虚弱无力。不但俄罗斯和中国否决了联合国(UN)决议，就连谴责叙利亚最强硬的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其实也在犹豫。而它们的犹豫不是毫无根据。

对于任何外部干预，关键问题不仅在于能否阻止杀戮，还在于能否决定性地扭转局面，有利于达成一个和平、可持续的政治解决方案。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发生，外国干预只能加剧冲突。

有时候外部干预显然取得了成效，在踌躇多年后，北约(Nato)最终平息了波斯尼亚战争。1999 年对东帝汶规模更加有限的干预行动也达到了目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最近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在班加西避免了一场恐怖的屠杀，而且仍有很大的可能性让利比亚拥有一个还算体面的政府。

然而，只需稍稍浏览一眼新闻，就能让你想起其他许多不那么成功的干预事件。在北约军队进驻阿富汗的十几年后——当时人们曾寄予厚望，希望能建立一个尊重人权的民主国家——如今，他们面对的是一场被重新点燃的叛乱。索马里——美国 1993 年出手干预，结果以失败告终——如今是失败国家的典型。伊拉克则变成了一场大屠杀。

不幸的是，叙利亚看上去像是一个外部干预极有可能会失败的国家。阿萨德(Assad)政权拥有强大的军队，相比卡扎菲(Gaddafi)统治利比亚时拥有更广泛的国内外支持。如果叙利亚战事升级，爆发长时期内战的风险将不可小视。在由谁来执掌叙利亚的问题上，多股外部势力——从伊朗到沙特阿拉伯再到以色列——均利益攸关，这意味着这场战事确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更大范围的地区性冲突。

对于阿萨德家族的继任政权将呈现出何种特点，答案也只是未知数。反对派势力不仅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还得到了基地组织(al-Qaeda)的支持——这必定是史无前例的头一次。

考虑到西方的武器曾经提供给了阿富汗塔利班的前身，西方世界应该极其注意一个问题：在叙利亚，他们究竟是在支持谁，又是在向谁提供武器。通过经济和外交渠道，外界应该向阿萨德家族施压——清楚地表明，他们绝不会重新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不过，主张以和平方式施压的人们应该坦率地面对现实。在目前的形势下，制裁和谴责性的联合国决议很可能来不及阻止一个政府在寻求自保的过程中所作出的野蛮行径。其他看似和平的方式——例如搭建难民避难所，或是建立人道主义通道以发放援助物资——其实是需要动用军事力量的。而若是按照沙特人的提议，向反叛力量提供武器装备，无疑会为冲突火上浇油。



一个令人更加不快的事实是，外国决策者的心中存有一种顾虑，他们必须掂量这样一个问题：多少才算是太多？如果这是一场大屠杀或是卢旺达夺走 80 万人性命的那种种族灭绝，那么毋庸置疑，干预的必要性将彻底压过人们对于后果的担忧。叙利亚目前的死亡人数据称已达 7000 人——这一数字无疑还会上升。这的确骇人听闻。但它还不足以成为冒着巨大风险对叙利亚进行外部军事干预的正当理由。

如果我亲眼看到了科尔文和她的同事们所目睹的恐怖景象，我的感受一定会大为不同。但有时，距离和淡漠也有其作用。感性反应并不总是正确的。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镜】

9-7 Jeffrey Gettlemam：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

内战频繁的索马里仿佛外交政策的墓地，由于不了解当地历史和背景，西方的武力干预均以悲剧告终。在过去 20 年里，这个国家仅有 6 个月的和平。在外国干预者中，美国是最糟糕的一个：美国军队曾在错误的时候，支持错误的军阀。

”

内战频繁的索马里仿佛外交政策的墓地，由于不了解当地历史和背景，西方的武力干预均以悲剧告终。在过去 20 年里，这个国家仅有 6 个月的和平。在外国干预者中，美国是最糟糕的一个：美国军队曾在错误的时候，支持错误的军阀。9·11 后，美国试图挑拨地方势力互相残杀结果再次弄巧成拙。2006 年，布什政府借埃塞俄比亚军队之手扶植了一个前军阀组成的过渡政府，终结了索马里 17 年来首次享有的短暂和平，导致非洲之角再次陷入无休止的混乱，数百万人推向饥荒边缘。

在摩加迪沙国际机场降落，你会被要求填写一张表格，除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外，还要求填上你所携带的武器。你也许会觉得难以置信，但在索马里首都，仍然还有几家航空公司，只是有的运气比较差。2007 年被击落的一架俄罗斯货运飞机的残骸仍然躺在跑道末端。

机场外面是世界上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冲突“纪念碑”：一幢接一幢被烧焦的建筑，连绵数英里变成焦土的街道。摩加迪沙的意大利式建筑曾经是印度洋边美丽的风景，如今变成了一堆破烂的砖瓦。自从 1991 年中央政府垮台后，索马里一直冲突不断。18 年，14 个失败政府之后，杀戮还在继续———自杀炸弹、白磷弹、砍头、吸毒的娃娃兵随处可见。偶尔还能看到美国产巡航导弹从天而降。在海上是同样的混乱无政府状态。索马里的海盗



正在扼杀世界最重要的航道之一。在海盗肆虐前，每年有 2 万艘轮船通过亚丁湾。2008 年，装备精良的索马里海盗劫持了超过 40 艘船只，获得多达 1 亿美元赎金。造成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海盗问题。

在过去 2 年半里，我 10 多次拜访索马里，对这个国家的混乱也逐渐有新的认识。在伊拉克费卢杰，感受过叛军的疯狂和暴怒，也曾在阿富汗的山洞里度过寒冷刺骨宁静得古怪的夜晚，但没有什么地方比索马里更让我感到毛骨悚然。刚踏上这块土地，也许还来不及抹去额头上的汗水，你可能已被绑架，或者脑门中枪。从南部基思马约（Kismayo）便于埋伏的沼泽，到摩加迪沙致命的城市迷宫，到亚丁湾边臭名昭著的海盗老巢布萨索（Boosaaso），无论从那个角度看，索马里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整个国家已变成军阀、海盗、绑匪、炸弹制造者、极端恐怖分子、雇佣军的温床。愤怒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没有学校可上，口袋里却装了大把子弹。不同于伊拉克，这里没有“绿区”，没有加固的堡垒，当你受伤或者陷入麻烦没有地方可以躲藏。在索马里，你只能依靠自己。当地医院物资奇缺，包裹伤口的纱布也不够。

索马里的混乱像瘟疫一样越过边界，引发邻国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暴力冲突，更别提扰乱国际航运的索马里海盗。麻烦的出口也许仅仅是个开始。和基地组织有牵连的反叛武装正在渗透整个索马里，把这个国家变成吸引国际极端分子、暴徒和匪徒的磁铁。这些人最终将回到自己的国家（如果他们能幸存下来）传播杀戮风气。索马里的过渡政府诞生于 4 年前，受联合国制裁，自诞生之日起就千疮百孔，它的气数将近，也许会引发另一场注定失败的国际救援行动。美国支持的老军阀总统阿卜杜拉希·优素福·艾哈迈德在与总理奴尔·哈桑·侯赛因长期纠纷中落败，终于在去年 12 月辞职。表面上，两人的冲突原因是处理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方式和几个内阁职位的分配。事实上，所谓冲突根本是个形式，因为政府已经没有控制国家的实权。今年初，索马里政府的控制区域减少到几个街区，而这个国家的面积相当于得克萨斯州。

就在局势似乎已经不可能更糟的时候，在索马里却依然能继续恶化。除了政治危机，一场全面饥荒正蓄势待发。饥荒的原因除了常年战乱、干旱还有国际粮食价格上涨和外国救援人员的撤退。上次索马里饥荒爆发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造成数十万人饿死。去年 5 月，在索马里一个饱受干旱折磨的地方，我站在一个简陋的窝棚外，亲眼目睹一个小男孩躺在垂死的母亲身边奄奄一息。她的衣服被汗水湿透，呼吸微弱，看样子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一位过路的老人说，“她大概是活不成了。”

索马里正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候，而整个世界就像我一样，在袖手旁观，眼看这个国家的战火和混乱持续了 20 年，却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过去的国际干预行动均以失败告终，没



有人再想涉足这一滩泥沼。在过去的外国干预者中，美国是最糟糕的一个：美国军队曾在错误的时候，支持错误的军阀，而且向来无视当地宗教和部落的传统势力。因为诸如此类的原因，索马里变成外国干预者的坟墓，错误的国际干预激化了部落和宗教冲突，加深了这个国家的不稳定，把数百万人推向饥荒边缘。

索马里是一个政治谜题———表面上统一，暗中各种势力分裂割据。理论上它应该是世界上最单一性的国家，全国 900 万至 1000 万人口几乎都说一种语言（索马里语），信奉一种宗教（逊尼派伊斯兰教），分享相同的文化，源于同样的种族。但事实上，在索马里一切都和部落有关。索马里人把自己分成五花八门的部落，大部落下面又有若干小部落，以此类推，错综复杂的背景和效忠关系让外国人理不清头绪。

19 世纪末，意大利和英国殖民者瓜分了索马里大部分地区，但他们推行西方法制的尝试屡屡失败。当地人碰到纠纷时依然习惯找部落长者仲裁。维持秩序的关键是威慑：“如果杀死我，你将遭到我的部落的复仇。”，英国人比较能容忍传统的部落纠纷仲裁方式，而意大利殖民政府则竭力排挤部落长老。长期来看，过去的英国属地比较意大利属地（比如摩加迪沙）相对稳定。

1960 年，索马里独立，这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人民依然过着游牧民族式生活，大多数目不识丁，但由于位处亚非交接的非洲之角战略位置，很快成为冷战的棋子。苏联人最早向这里输出武器，美国武器接踵而至。索马里在转眼之间成为外国武器的垃圾堆。中央政府形同虚设。甚至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索马里的统治者，反复无常的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将军（1969 年至 1991 年执政）还被嘲弄为“摩加迪沙市长”，因为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已经不受政府控制。

1991 年，当巴雷终于被军阀赶下台，接下来的情况正如所有人所预料。军阀们陷入混战，动用了手头所有武器。任何值钱的东西———每个港口、每条飞机跑道、每个渔码头、每条电线杆———都成为争夺目标。人们为了几个硬币相互残杀。女人被强奸。未成年人也卷入战争。混乱中诞生了一群发战争财的投机商，其中包括军火走私犯、毒品贩子、劣质奶粉进口商，这一部分人巴不得混乱和战火永远持续下去。索马里是现代世界中最接近托马斯·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的地方，这里的生活短暂、残酷而肮脏。称之为“失败国家”都是对它的抬举。民主刚果共和国或津巴布韦可称为失败国家，它们的军队和政府也许腐败但至少还算是真正的国家军队和国家政府。自 1991 年起，索马里已不能算是国家，而只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有边界却无政权。

1992 年，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试图伸出援手，派遣了几千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去索马里保护运送食物的船只。冷战时代刚刚结束，许多人认为“新世界秩序”拉开序幕，



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可以随心所欲地按它的理想引导世界。索马里被证明是一个糟糕的开始。布什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毫不了解索马里的部落背景，无法理解索马里人对部落领导的誓死效忠。在内部纠纷的压力下，索马里社会往往会分崩离析，但在遭遇外来敌人时，又会立刻团结起来。美国通过惨痛的教训才了解到这一点。美军试图逮捕当时霸占一方的军阀穆罕默德·法拉德·艾迪德。结果造成 1993 年 10 月在摩加迪沙上演的惨剧。成千上万名武装的索马里人冲上街头，他们携带火箭炮、手榴弹、手持自动步枪，击落了美军直升机，杀死 18 名美国士兵，把他们的尸体拖上街头游行。这是美国人武力干涉索马里所获得的第一个教训，后来被改编成电影《黑鹰降落》。

美国人颜面尽失，立刻撤离了这个是非之地。索马里又陷入混乱的“自然状态”。接下来 10 年里，西方国家对这个地方惧而远之。但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势力（许多来自沙特阿拉伯）和瓦哈比教派的追随者慢慢地悄悄地进入索马里。他们在当地建起清真寺、古兰经学校和社会服务机构，鼓励伊斯兰教的复兴。21 世纪初，摩加迪沙部落领导人建立起一个松散的社区法庭网络，为这座急需法治的城市提供了一点儿秩序。他们逮捕窃贼和杀人犯，把他们关进铁笼，举行审判。伊斯兰教教法是唯一被不同部落所认可的统一法律；部落长者称他们的执法网络为“伊斯兰法庭联盟”。

摩加迪沙的商人看到了一个机会。摩加迪沙不缺少军阀和财主。当军阀把这个国家弄得四分五裂时，财主们竭力维系了这个国家的勉强统一，提供通常是政府提供的服务———比如医疗、教育、电力供应、邮政等等———当然，这些服务的价格不菲。财主们甚至帮助维系调节索马里的货币政策。索马里先令的价值在上世纪 90 年代———没有中央银行的情况下———甚至比有挂名政府的 80 年代更稳定。但是巨大的商业利益也伴随巨大风险，比如绑架勒索。伊斯兰武装提供了一种解决办法。他们成为无需纳税的军队，没有政府的政权。财主们开始向他们购买武器。

2005 年，美国中情局再次错误阅读索马里局势，导致第二次失败的干预。

9·11 恐怖袭击后，索马里成为重点盯防地区。美国担心索马里会像阿富汗一样蜕变成圣战工厂，成为基地发动第二轮袭击的据点。然而这一担忧仅仅是捕风捉影，并无实际证据的支持。一些西方军事分析者告诉政客，索马里太混乱，连基地组织也无法对付，因为这个地方太难懂，不知道到底可以信任谁，即使恐怖分子也需要可信的同盟。虽然如此，固执的乔治·W·布什政府依然制定了一个廉价扫除伊斯兰极端分子的策略。中情局特工暗中笼络军阀，试图用他们对付伊斯兰极端分子。然而，多年来正是这些军阀搞得索马里生灵涂炭，民不聊生。2008 年 3 月我曾采访一名当地军阀。他告诉我，两名美国特工詹姆斯和大卫曾携带装满钞票的皮箱找到他家门口。特工告诉他，“用这些钱购买枪械。有



任何问题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我们。”这名军阀还告诉我两名特工提供的邮件地址是：no_email_today•yahoo.com.

这个计划最后弄巧成拙。索马里人天性喜欢夸夸其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国家拥有非洲大陆最好最廉价的移动电话服务。传闻像风一样传播开来，已经招人深恶痛绝的军阀们被收买，成为美国人的走狗，这反而使伊斯兰武装更受拥护。到 2006 年 6 月，伊斯兰武装将最后一批军阀赶出摩加迪沙。接着发生的事情让所有人瞠目结舌：伊斯兰武装似乎成功整治了这个曾经被认为不可能被驯服的地方。

这是我的亲眼所见。2006 年 9 月，我飞抵摩加迪沙，目睹工作小组在城里收集垃圾，孩子们在海滩上游泳嬉戏。多年来，夜晚第一次没有听到枪声。在伊斯兰的旗号下，武装分子统一了相互争斗的部落，在部落领导的支持下，收缴了大部分平民的武器，甚至成功镇压了肆虐的海盗。他们首先利用部落关系，成功说服海岸城市不再支持海盗，如果这一招不管用，就派军队突袭被劫持的船只。根据伦敦国际海事局统计，2006 年，索马里海岸共发生 10 起海盗袭击事件，是 10 年来最少的一年。

伊斯兰武装对索马里统治时期是 1991 年来，这个国家仅有的和平时期，虽然只持续了 6 个月。团结起来推翻军阀是一回事情，决定下一步行动却是另一回事。在伊斯兰组织内部，温和派和极端派迅速分裂。极端派继续推动圣战。其中一个最激进的派系叫 Shabab，是一个由多个部落组成的军事阵线，信奉瓦哈比教派。Shabab 成员开着黑色敞篷货车在摩加迪沙横冲直撞，看到裸露脚踝的妇女就施以拳打脚踢。他们恶名昭彰，其他伊斯兰武装分子对他们也惧怕三分。2006 年 12 月，在阿拉伯茶（一种有迷幻作用的树叶，当地人当成口香糖一样咀嚼食用）被收缴后，一些当地民众开始反抗横征暴敛的 Shabab.Shabab 领导人据说和外国圣战分子有紧密联系，其中包括基地恐怖分子。美国国防部后来把 Shabab 加入恐怖组织名单。美国官员声称 Shahab 组织藏匿恐怖分子，其中包括制造 1998 年制造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美国大使馆爆炸案的嫌疑犯。

索马里也许确实藏匿着少数阴险的国际歹徒，但如果硬要说这个国家是恐怖分子温床未免夸大其辞。2006 年，曾有机会让索马里伊斯兰组织中的温和派分离出来。一些美国官员确有这样的打算。其中包括美国众议院非洲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唐纳德•M•佩恩。佩恩和其他几位美国官员曾和伊斯兰温和派对话，鼓励他们和索马里过渡政府达成权力分享协议。

但是，布什政府再一次决定依靠武力。美国兵不想自己卷入战争。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火尚未平息的时候，又开辟第三片战场无疑等于发疯。因此，美国决定借刀杀人，这次他们决定利用埃塞俄比亚军队。这将是美国的第三次干预行动。



埃塞俄比亚是美国在非洲最好的朋友，它的政府是美国一直以来竭力塑造的“被伊斯兰极端主义包围的基督教防波堤”。埃塞俄比亚领导人懂得投其所好，言谈很讨布什政府喜欢。他们说，伊斯兰武装是恐怖分子，无法无天，威胁整个地区的稳定，甚至可能袭击邻国肯尼亚的美国游客。

当然，埃塞俄比亚政客有自己的小算盘。埃塞俄比亚的统治阶级大多是基督教徒，而这个国家有近半人口信奉伊斯兰教。在当权者看来，伊斯兰运动觉醒是迟早的事情。此外，埃塞俄比亚正与多股叛军作战，其中包括一支索马里族人组成的强大武装。埃政府担心一个伊斯兰的索马里政府将成为叛军的后台和外国基地。埃塞俄比亚人还担心索马里武装分子和埃国主要敌人厄立特里亚结盟。最后的结果证实他们的担忧绝对正确。

在华盛顿，并非所有人都相信埃塞俄比亚人的话。这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令人担忧。埃塞俄比亚政府军队被控欺压本国民众。但是，2006 年 12 月，布什依然向埃塞俄比亚提供珍贵军事情报，授权他们入侵索马里。数千名埃塞俄比亚士兵越过边界（有一部分人几个月前已经陆续潜入），几周之内击溃伊斯兰武装。在埃塞俄比亚军队中甚至混有美国特种兵。美国还发动了多次空中袭击，试图清除伊斯兰武装的领导人。美国巡航导弹多次打击所谓恐怖分子据点，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让反美情绪更加高涨。

伊斯兰武装转入地下，过渡政府在索马里成立。有人欢呼，更多人嗤之以鼻。短短几天内，混乱局面卷土重来。过渡政府主要由前军阀组成，是自 1991 年以来，索马里第 14 次尝试组建中央政府。之前的 13 次纷纷失败。最新的过渡政府从成立第一天就备受指责。部分非议确实是无中生有。但多数指责集中于过渡政府的无能。从一开始，政府领导人似乎就只关注自己能得到什么样的头衔，而不是关心与职位相应的职责。这个政府试图用残酷手段铲除叛军（结果失败）加之它严重依赖埃塞俄比亚军队，很快就失去主要部落的支持。由于欧加登地区的归属问题，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多次交战。埃塞俄比亚现在宣称拥有该地区主权，但这个地区大部分居民为索马里族，因此，与埃塞俄比亚结盟被视为等同叛国。

伊斯兰势力利用这一情绪，自诩真正的索马里民族主义者，得到广泛支持。伊斯兰反叛武装和索马里部队之间爆发激烈枪战，导致数千平民丧生。埃塞俄比亚军队往往不加区别地炮轰整片地区（引发欧盟的战争罪行调查），并使用惨无人道的白磷弹（这种化学物质接触氧气产生黄色火焰，造成致命烧伤，接触人体的磷颗粒会一直燃烧，严重的可腐蚀骨头。）战乱逼迫数十万人搬离摩加迪沙，居住在帐篷里。这些临时定居点成为疾病和仇恨的温床。死亡比从前任何时候更频繁地降临。我认识一名男子，他和妻子正在打电话，



突然一块迫击炮弹片从天而降，把他的妻子切成两半。另一名男子外出散步，碰上交火，腿部中弹，他倒在地上等了 7 天直到交火结束，这 7 天他一直靠吃草维生。

对外国记者，索马里更是死亡之地。现在，很少有外国记者敢于踏上这片土地。绑架是外国人面临的最大威胁。在肯尼亚为联合国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如果没有私人保镖，在索马里遭到绑架或被枪杀的机会是 100%.现在，我踏上索马里土地的第一件事就是雇佣 10 个彪悍枪手充当保镖。

1 月末，过渡政府控制的地方只剩下一小块联邦政府领地，范围还在不断缩小。这片政府领地由一小群非盟维和部队成员把守。埃塞俄比亚军队前脚撤离摩加迪沙，为填补权力真空，各伊斯兰武装派系之间立刻爆发战斗。伊斯兰武装只用了几天时间就从政府军手中夺回全国第三大城市拜多阿（Baidoa），立刻实施伊斯兰教教法。目前，Shabab 在当地并非广受欢迎，但他们确实令人畏惧；目前，他们拥有一支目标明确，纪律严明的千人军队。虽然一位信奉伊斯兰教温和派的前伊斯兰法庭联盟领导人当选新总统，混乱的交战局面依然没有停息的迹象。

假如 Shabab 派控制整个国家，也许不会满足于此。他们可能派最强悍的战士进入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吉布提，尝试收复这些国家的索马里语区。这一直是泛索马里国支持者的梦想。实现这个梦想必然导致冲突国际化，把邻国及其盟国拖入这场战争。

Shahab 还可以发动一场不对称战争，对信仰异教的索马里邻国发起恐怖袭击，甚至可能在美国发动袭击。这无疑等同火上浇油，激化其他地区冲突。首先，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就因为边界纠纷战火不断，已导致 10 万人丧生。两个国家在边境上都囤积重兵。如果号称拥有厄立特里亚支持的 Shabab 接管索马里，世界很可能看到第二轮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战争。最糟糕的情况是，整个地区的数百万人因战乱流离失所，影响当地粮食生产，切断国际救援线路。简而言之，一场饥荒将在世界最贫困的地区爆发。

最艰巨的挑战在于阻止最糟糕情况发生。迄今为止我所听到的最好建议是利用索马里社会流动、分散的特性，依靠地方机制解决冲突。秩序基础建筑在部落为单位的村庄、城镇和社区政府之上。这些小单位再组合成地区政府。最后一步是把地区政府联合起来，组成松散国家联邦，共同管理协调全国事务，比如制定货币政策、打击海盗等等。

西方国家应该在过渡政府依然存在的时候，竭尽所能帮助伊斯兰温和派加入过渡政府。无论外人是否赞同，许多索马里人相信伊斯兰教教法是解决国家问题的答案。也许他们并不喜欢 Shabab 派强加给他们的苛刻教法———至少有一名少女被强奸后反被伊斯兰法



庭判处通奸罪，遭乱石砸死———但适当程度的伊斯兰统治却是相当一部分索马里人的愿望。这一意愿不能和支持恐怖主义混为一谈。

一种更激进的观点主张联合国接管索马里，像在东帝汶一样实施委任统治。但索马里原本就是一个独立国家，这一方案恐怕很难被索马里人所消化。即使通过这一方式，联合国也必须把权力分配给部落领导，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的势力都不容忽视。根据前车之鉴，外交官们应该更多和索马里财主合作，减少对军阀的依赖。

但是索马里的最大问题在于，经过 18 年的混乱，伤亡惨重，一拨拨的军阀崛起又被推翻，现在已经很难判断谁是真正的领导人，甚至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人存在。需要修复的不仅是摩加迪沙被战火摧毁的建筑；更需要修复的是这个国家的国民精神。这是个深受创伤后遗症荼毒的国家。索马里国民必须冲破狭隘的部落利益，过去也许这曾经是他们的保护层，但未来，他们更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

即使一切尽如人意，挑战并未结束。近一代索马里人对政府毫无概念，更无从了解政府的职能。在索马里各个角落，我曾碰见这失落的一代，他们目光空洞，口袋里装满子弹，手持卡拉斯尼科夫冲锋枪，在街头闲逛，无所事事。对于他们，法律和秩序都是绝对抽象的概念。对于他们，唯一的生存法则就是手中的冲锋枪。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9-8 莱恩·穆勒森：从民主和平理论到强制性政权更迭



莱恩•穆勒森：塔林大学法学院院长,前戈尔巴乔夫法律事务顾问。

“问题在于外人不能帮助所有反叛者，更重要的是，每个国家的国内情形都各有不同，在一个国家奏效的做法在另一个国家完全不起作用。与此同时，外国的支持虽然不足以让反叛者在斗争中占上风，但他们在当局愿意做出让步的情况下仍然拒绝妥协。他们坚决要求现政权下台，只有处决或杀掉领导人及其支持者才能让他们满意。有时候这种策略可能奏效，但往往导致无休止的内战和更多的流血。”

当前，叙利亚的局势仍然引起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美、英、法等西方国家试图颠覆阿萨德政权，并以人道主义干预理论为其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辩护。西方国家推广民主和干涉他国内政的思想根源何在？民主与和平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如果实现了全球民主秩序，世界就一定安享和平吗？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讨论都可以在著名国际法专家、爱沙尼亚塔林大学法学院院长莱恩·穆勒森(Rein Müllerson)教授于2012年7月8日发表在爱沙尼亚《彩虹》(Vikerkaar)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从民主和平理论到强制性政权更迭》中找到。我们未必完全同意作者给出的答案，但作者的思考和论述角度无疑将对该领域感兴趣的读者产生一些启迪。

莱恩·穆勒森2009年曾出版《民主：人类的命运？》一书，本文也被收录于他即将于2013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从民主和平理论到强制性政权更迭》。作者从阿拉伯之春及其之前的颜色革命等政权更迭的案例引出民主和平理论为这种政策和人道主义干预辩护的话题。在回顾民主和平理论的历史后，作者分析了民主和平理论存在的种种问题，随后追溯了该理论的康德哲学渊源以及它与当前国际局势的关系。正如作者所说，新康德主义全球



和平理论的复兴促使人们从思想上为外来“干涉”辩护，干涉的结果却与民主没有任何关系。有证据显示，民主并非和平的前提，倒是和平促成了民主。即便全球实现了民主化，世界也不一定太平。

新康德主义全球和平理论的复兴促使人们从思想上为外来“干涉”辩护，然而，干涉的结果却与民主没有任何关系。有证据显示，民主并非和平的前提，倒是和平促成了民主。即便能够实现全球民主秩序，世界也不一定太平。

现今的政权更迭(阿拉伯之春和更早时期的前苏联某些加盟共和国出现的颜色革命)都提出了国际关系(IR)理论和国际法方面的相关议题。议题之一就是民主和平理论(Democratic Peace Theory)。政权更迭的政策或是受经济和战略利益的驱动，或是外部势力鼓噪、协助和怂恿的结果，而民主和平理论恰恰为这些政策提供了支持和论证。另一个议题则是为了人道主义目的而使用武力的问题(“人道主义干预”或者“保护责任”)以及对国内冲突的干预问题(军事干预或其他干预)——这种干预要么是支持政府，要么是支持反对派。

一、民主和平理论及其政治

支持在全世界推广自由民主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相信所谓的民主和平理论。伊曼努尔·康德在 1795 年发表的论文《论永久和平》奠定了该理论的哲学基础。1964 年，美国社会学家迪恩·巴斯特(Dean Babst)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民选政府——和平的力量》的文章，文中引用了昆西·莱特(Quincy Wright)的经典著作《战争研究》，后者对 1480 年到 1941 年的重大战争进行了分析。巴斯特的结论是：拥有民选政府的独立国家的存在(即民主社会)将极大地增加维持世界和平的机会。冷战结束前，康德的哲学专著被视为与现实世界没有多大关系的抽象哲学的杰作，同时也很少有人记得或者提到巴斯特的文章。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有关这一话题的兴趣开始陡增，有些学者声称民主国家或者自由国家之间没有发生战争是国际关系的事实，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经验法则。鲁道夫·拉梅尔(Rudolf Rummel)声称：“只有在至少一方是非自由国家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国家间的暴力冲突。”但是，20 世纪 90 年代见证了苏联解体和中东欧新一波民主化浪潮，也看到了人们对新康德主义民主和平理论的兴趣大为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民主和平理论”应运而生。这个理论的要点就是：世界上的民主国家越多，军事冲突的危险就越少，因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或者如克林顿总统在现实政治层面指出的那样，“最终来看，确保我们安全和建立可持续的和平的最佳战略就是支持其他地方的民主运动”。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冲突是天生的，它源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本质，与国家的国内特征并没有多大关系。与此相反，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民主



和平理论更多关注国家的性质和民主特征。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支持者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认为，民主和平理论和现实主义在一个关键点上产生了分歧：

前者认为国家内部的变化能够改变国际政治的性质。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即使国家内部发生了变化，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仍然保持不变。因为体系的结构是国际政治结果的首要决定因素，结构性限制意味着不管国内政治体制如何，处于相似地位的国家的行为也会相似。[1]

在民主和平理论的支持者看来，统计学研究给出的有些解释证明了他们理论的正确性。首先，民选政府对民众负责，因为民众承受战争的冲击，民主国家自然比非民主国家更加爱好和平。第二，因为民主国家解决国内问题和冲突的方式不是使用武力而是通过协商和妥协，它们会把这些程序延伸到对外关系上。这两大特征中的第一个有时候被称为“制度约束的作用”，即民主机构内天生的权力分离和制衡，公共舆论在让民主变得更加和平方面也具有限制性作用。第二个被称为“规范性影响的作用”，意思是国内的民主规范和协商文化可向外延伸，用以指导国际关系。最后，有人指出，因为民主国家往往更富裕，一旦发生战争，造成的损失往往比贫穷的国家更大，这也被认为是民主国家爱好和平的理由之一。

民主和平理论的最坚定支持者持一种双体论的观点(dyadic theory)，认为民主国家间不会发生战争。相比之下，持民主和平理论的单体论观点的人要少一些，他们认为民主国家总体上更加爱好和平。民主和平理论的双体论观点认为，因为民主国家相互开放和信任，解决国际冲突就像解决国内分歧一样，是通过对话、妥协和让步实现的。因为非民主国家本身不透明，其国内的不满要么被压制，要么以武装叛乱的形式爆发出来，因而，这些非民主政权是不能被信任的：正如民主国家处理国内政治的方式一样，非民主国家处理国内政治的方式也会产生外部效应。虽然在原则上，这些解释可以用来支持民主和平理论的单体论，后者声称不仅民主国家不会发生战争，同时民主国家也很少对非民主国家发动战争；然而，持民主和平理论的单体论的人还是要少些，因为这种观点明显与现实相矛盾。甚至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也会对非民主国家发动战争，这种冲突的发起者也不一定是非民主国家。

二、民主和平理论的问题

从直觉上看，若对比一下当今欧洲大陆与不久前的过去，人们或许确实相信民主和平理论。欧洲的历史与其他大洲的历史同样血腥，上个世纪的两次欧洲战争把其他国家也卷进来，并使得国内冲突演变成为世界大战。但自 1945 年以来，西欧确实拥有了历史上最长



时期的和平。比如，虽然当今法国和德国的民主本质或许不是让两者不发生军事冲突的根本原因，但它确实有助于让这两个宿敌维持牢固的和平。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其他许多欧洲国家。但是，即使在欧洲背景下，民主和平理论也存在严重问题。首先，用来证明民主和平理论的统计数据的时间段相对较短，民主国家的存在的历史本身也不长，尤其是当我们把民主国家局限在“成熟的”或“自由的”民主国家而不是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的时候。詹姆斯·李·雷(James Lee Ray)注意到，“现有的大部分民主国家出现在冷战时期”，这说明该“历史时期在涉及民主国家的关系时或许有特殊性，只有时间才能说明这一点，即假若没有来自苏联的严重威胁的话，最近这些年出现的民主国家中的大部分是否会发生战争”。

大部分民主国家确实是在冷战时期出现和成熟的，它们都属于两极世界中感受到共产主义竞争者威胁的同一个阵营——西方阵营。这自然让阵营内部的所有冲突都从属于主要威胁，即来自东方集团的军事或意识形态威胁。与此因素有关的是西方阵营中的领袖——美国——的角色。华盛顿是老大哥，它不仅保证西方阵营中小兄弟们的安全，使之免受外来威胁，而且维持阵营内部的秩序(虽然应该强调的是，这些小兄弟服从华盛顿的领导与东欧成员屈服于莫斯科的权威相比有着更多的自愿色彩)。但是，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是正确的，他说：“用概念术语的话，民主和平理论的主要失败在于它不承认霸权领袖在创造、保护和扩张民主和平区域中的角色。”在两极世界内的部分地区的确存在着单极霸权下的和平。不仅仅是军事威胁，同时，充满意识形态威胁的极权主义对手的存在，也在自由民主国家屈服于保护者的意志方面发挥了作用——该保护者扮演了本地区所谓的“第一世界”利维坦的角色。对内实行民主的美国，在国际上却一直是霸权国家。该因素一方面有助于冷战时期成熟民主国家阵营的民主和平实践，另一方面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作为霸权国家在与其领导下的成熟自由民主国家之外的国家打交道时往往侵略成性。即使在今天，启蒙遗产(enlightenment's legacy)的“冷酷一面”——它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并且其目标或许不仅仅是自由，还包括主导地位——仍旧充满了马蒂·克斯肯尼耶米(Martti Koskenniemi)所界定的一种倾向，即“使得某种片面的观点看起来具有普世性的霸权斗争”。

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把国家分为前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和后现代国家，他相信美国从其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来看属于遵从马基雅维利原则和国家理性的现代国家，虽然其国内结构和过程更类似于欧洲的后现代国家。若考虑到把美国与加拿大和多数欧洲国家并列为后现代国家的可能性，库珀写道，“美国就更加令人怀疑，因为我们不清楚美国政府或者国会是否认为相互依赖性有必要或值得追求，是否愿意接受多数欧洲政府现在实行的开放性、相互监督、相互干涉的相关结论”。与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的这些不同被归结



为华盛顿的全球领袖意识，库珀客气地称之为“捍卫文明世界的责任最终落在自己肩上的意识”。更公正、更具批判性的观察家可能认为，这是相信自己的观念具有普世性的霸权者的认识，坚信只有在遭遇受狭隘的自我利益支配下的非民主国家时，美国的利益才会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正如库珀自己所说，这个逻辑的问题是：“在强调人权和自决权的自由世界中，霸权思想已经不再为人所接受了。”这些话写于 20 世纪 90 年代，当时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还没有像今天(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样强大和好斗，也看不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影子。在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更具多极化和多样性的当今世界，霸权就变得更加不被接受。让一个霸权中心来管理一个全球化中的世界，根本是力不从心。今天的欧洲由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组成，它们之间似乎没有发生武装冲突的现实可能性。至少从直觉上判断，虽然欧洲国家的民主本质似乎是排除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首要因素，但是仍然存在其他因素。最重要的因素是：欧洲国家不仅是后现代国家，而且欧洲的国家体制还是库珀所说的“后现代国家体系”(post－modern state system)。西欧、中欧和东欧国家共同构成了这个国家体系，用库珀的话说，其特征包括：国内事务与国外事务直接界线的消除；相互干涉彼此的(传统上的)国内事务；正式拒绝使用武力解决相互间的冲突，未来也不大可能发生使用武力的情形；领土边界越来越失去其重要性；以及建立在透明、开放和相互依赖基础上的安全。欧洲自由民主国家拥有相类似的国内政治和经济体制以及大体上相同的历史(最为血腥的历史)。不仅如此，它们也创造了独特的国际体系，在这里，现实主义原则(无政府主义、对相对权力的关心、囚徒困境等)要么根本不适用，要么只扮演第二位的从属性角色。在这里，莱恩所说的国际政治体系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它已不再是无政府主义，或者说，不再是与整个国际体系或其他地区性国际体系一样的无政府主义。

欧洲国际体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或许可以说它不再是霍布斯体系，而是变成了康德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国家甚至(在面对其他民主国家时)在此国际体系之外也采取同样的行为方式。而且，欧洲国际体系很难在全球复制，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行。谁敢肯定如果中国变得更加民主，它就会与美国建立起类似法国和德国或荷兰和西班牙那样的关系？为什么专制政权的统治者(而不是民选政府)更倾向于和平方式(通过行贿、朝廷联姻、弱小的一方在眼看失败不可避免时撤退)？解决冲突的原因不止一个。当然，这并不是说专制国家的世界就比民主国家和平得多——当然不是。

但是，它意味着，即使世界有可能实现民主，天下也不一定太平。而且，民主和平理论的支持者把民主理解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而后者只是未来政治性安排的有限版本之一。伊多·奥伦(Ido Oren)曾说：“民主和平论关注的并非民主本身，它关注的是‘美国式的’或‘我们这样’的国家。用来定义民主的看似客观的规范和原则其实代表了美国的



价值观。”世界上存在着争夺霸权的斗争，这一点非常明显，不容置疑。从全球来看，只有一个世界霸权，那就是美国，它有时候采取单边行动，但通常是与盟国一起行动。乔治·布什的一个助手曾经向罗恩·萨斯坎德(Ron Suskind)解释在当今世界现实是如何创造出来的：

我们现在是帝国，当我们行动时，我们创造了现实。在你们研究那个现实时，在你们从法律上研究它的时候，我们将再次行动，创造其他新的现实，你们当然也可以研究，情况就是这么回事。我们是历史的创造者。你和你们所有学者不过是来研究我们做了什么。[2]

上述这番话不仅傲慢自大而且充满幻觉，因为华盛顿控制和主宰事务的能力越来越萎缩——仅仅在苏联垮台后出现了非常短暂的单极时代特征。布什助手的说话方式表现出极端的傲慢、无知和天真，尽管如此，仍有许多有思想、有知识的美国人也持有类似想法。耶鲁大学法学教授约翰·法比安·维特(John Fabian Witt)最近在《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一篇文章中对无人机的使用做出了许多有趣的评论，他写道：“在美国政府内部，五角大楼的杰伊·约翰逊(Jeh C. Johnson)和国务院的高洪柱(Harold Koh)等律师，正与来自司法部、白宫和其他地方的数百位律师一道，创建一种规范定点清除行为(targeting process)的新体系。”我很熟悉和尊重国务院法律顾问高洪柱教授，我敢肯定，他和国务院、国防部或司法部的同事在为轰炸目标确立国际法原则(维特的文章是关于国际法的)，但是，如果维特说的“其他地方”不是指中国、俄罗斯、法国、德国、巴西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外交部、国防部和司法部的话——人家并没有委托美国政府为全世界制定国际法的艰巨任务——他的评论在实质上(如果不是在口吻上)与布什总统的助手对罗恩·萨斯坎德的话就没有两样。这种心态不是没有危害的，虽然它或许确实有助于创造新的现实，但这些现实往往与华盛顿的期望背道而驰。

但是，当地区强国如中国(如在南中国海)或者俄罗斯(如在高加索)声称在自己的边界附近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时，全球霸权马上就开始大喊“狼来了”，它会说，当今世界一定不能有势力范围，只存在西方定义的普世价值和利益(其内容包括自由市场、民主和世俗主义等)。但是，在被用于“出口”时，“启蒙遗产”的这一人道主义面孔存在着严重问题。尽管在许多非西方国家有着众多接受过西方教育和影响的人物，他们鼓吹自由和民主，但是，在实践中，这种革命往往最终要么陷入混乱和失败的状态，要么回归独裁时代或导致失败国家。为什么会这样呢？

即便西方价值观在原则上能够普遍化，这也并不意味着所有社会都愿意立即引进。有时候，用药过猛不但治不了病，反而可能要了病人的命。最终的结果取决于很多变量。亨



廷顿(Samuel Huntington)已经辨认出有助于巩固新兴民主的条件：(1)从前有民主化努力的经验(即使是失败的经验)；(2)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3)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以及外部援助；(4)民主转型发生于世界范围的民主化浪潮出现之前，这表明民主的动力主要来自内部而不是受外部势力的影响；(5)拥有和平(而非暴力)转型的经验。托马斯·卡罗特斯(Thomas Carothers)并不将这些或者其他因素看作是民主化的前提条件，相反，在他看来，它们代表了民主化的核心“促进因素”或“阻碍因素”——它们使得民主化的进程变得更加困难或是容易。如果有人进而指出，这些“阻碍因素”的组合将使得民主化(至少在现在)变得根本不可能，那么，我们有可能会认同这种方式。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在很少或根本没有任何民主经验的社会中进行民主改革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不能轻易推动。正如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注意到的，如果在没有国内需求的情况下从外面引进民主制度，而没有习惯于自由的民众的推动，它会分崩离析。在推广民主或引进民主时，有必要牢记民主化必须是由需求方推动而不是由供应方推动的。只有当民众拥有建立民主机构的强烈愿望以及存在最低限度的物质和文化前提时，供应方才能发挥积极作用。否则，其作用就是破坏性的——请原谅我在这里借用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创造性破坏”理论(creative destruction)。这样的破坏很少有创造性。

如果我们因为其独特性而将冷战时期排除在外，民主和平理论的统计学画面就变得更加模糊了。因为民主的标准没有共识，有些作者认为某些战争是在民主国家之间进行的，而有些理论家则反对这么说。比如，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认为，1812 年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战争并不是两个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因为在他看来，英国只是到了 1832 年改革法案之后才成为民主国家。克里斯托弗·莱恩分析了民主国家间的四场“差一点发生的”战争的案例(1861 年英国和美国的特伦特号事件、1895～1896 年英国和美国的委内瑞拉与大英帝国边界争端、英法两国对于上尼罗河地区控制权的争夺以及 1898 年的法绍达事件、1923 年法国和德国的鲁尔危机)。在他看来，现实主义理论更能够解释为何这些危机没有导致武装冲突：弱小的一方总要退却，因此就避免了当时的军事冲突。莱恩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观察到：“一个国家面对的外部威胁(或它认为的外国威胁)越大，其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就越充满‘专断性’，其政治结构也将变得越加集中。”把该观察作为一个原则来表述的话，我们可以说，不是民主导致了和平。相反，从长远看来，是和平有助于民主的出现和维持。而且，即使在自由民主国家，其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也很少公开，与国内政策的制定过程相比，它较少受到议会的控制和约束。正如莱恩写到的，“在外交政策领域，法国和英国在民主方面与第二帝国没有多大不同”。即使在成熟的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情况也同样如此。政治问题、政治正统以及其他政治机制使得外交事务(较之于国内事务)更少受到立法和司法的监督。一些近期的动向——比如巴基斯坦、也门



和其他地方的无人机袭击以及(通过奥运会或 Stuxnet 病毒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网络战争——已经提出了行政权与立法机构的关系问题。正如马娄·伊诺森特(Malou Innocent)所言：“以广泛的行政权理论为基础，奥巴马总统及其继任者有权力把人(包括美国公民)作为致命瞄准的目标，而不需要透明、问责和国会认可的假象。”由于它提出了一个微小但重要的细节(它提到了“美国公民”)，这个正确的评论值得我们稍微转移一下关注点。人们似乎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或下意识的假设，即如果对准非美国人就没有问题，美国公民值得特别的、更高规格的保护。这种态度如果不是直接违背国际法(非歧视性原则)，也肯定导致了在具体情况下违背国际法的行径。

不仅如此，在操纵民意以准备使用武力时，民主国家的政府的技巧完全可以与非民主国家相媲美。每当媒体持久密集地关注一个冲突，尤其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一方犯下的罪行上时，通常有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这或许是一个很罕见的情形，即城中只有一个无赖，他身边还有一些愤世嫉俗的自私的操纵者和支持者。第二，常常出现的是，“政权更迭”处于准备之中，对一个主要的罪魁祸首大肆攻击，而其他人则被描述成无辜的受害者或自由战士，这通常意味着为了政权更迭使用“一切可能手段”的前奏和准备。不仅如此，有一种说法认为，民主国家不会轻易参与战争，因为在民主社会中，是人民(即选民)承受了军事冲突的冲击，他们要付出钱财甚至是牺牲性命。然而，这种说法仅仅是部分正确。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资助战争的问题。这里，有必要强调在军事技术上比潜在或实际的敌人先进得多的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常常只使用空军力量(而且越来越多地使用无人机)对付敌人，这就导致它们的人员伤亡要比敌方的战斗人员、甚至是平民少数十倍、甚至上百倍。

三、康德和 21 世纪

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一文中列出了通向永久和平的六个初始步骤。如果考虑到康德时期和当今世界的政治现实的话，有些内容可能不怎么符合实际情况，但每个步骤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康德的前提之一是政府不应该借钱打仗。这个初始条件确实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把民主与和平的观点联系起来。多数人特别不喜欢的税收是民主的基石之一。“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或许可以颠倒过来变成“不纳税无代表”。在沙特阿拉伯或者其他能源丰富的专制国家，无纳税或低税负实际上成为政府贿赂民众的手段，民众在国家事务上没有多少或根本没有任何发言权。其他能源型专制国家，如土库曼斯坦，根本不对公民收税，反而使用从丰富的自然资源中得到的租金来贿赂民众。

在此背景下，一个有趣的、特别的事情就是乔治·布什的减税措施，这恰恰发生在美国几乎同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两场重要战争的时期。在以前，美国政府使用税收支撑



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实施了“高累进税制体系”。美国城市研究所(the US Urban Institute)已经注意到，“就像1941年12月7日的事件一样，‘9·11’袭击激发了强大的‘团结在同一旗帜之下的效应’(r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因为美国人已经做好了为战争做出牺牲的准备。但是与珍珠港袭击不同，在‘9·11’袭击之初，没有人谈论将增税作为战争动员手段的问题。正如早期的领袖诉诸美国人的爱国热情而增税一样，某些政客使用同样的策略鼓吹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减税。通过借债而不是增税，布什政府不仅把战争的负担从这一代人转嫁到下一代人，而且还从当代人那里得到了战争的授权。这是对当代人的贿赂，它牺牲了后代人的利益。不由分说，资助这样的战争与康德的永久和平前提格格不入，也与民主的基本观念相矛盾，尤其是当这些战争是主动选择的而不是必然结果时。同样，今天战争的经济负担不应该被转嫁到后代身上。正如美国最伟大的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所说：“纳税是我们为文明付出的代价。”

在研究世界不同地区的政权更迭的背景下，民主和平理论必须面对其他一些挑战。比如，有些专家已经指出，虽然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间没有发生过战争或许是真实的，但是，专制国家和威权国家的民主转型常常充满了危险——过去200年的历史证据表明，在这个阶段，国家更容易走向战争。身处民主转型中的国家也确实与其他民主国家或正在民主化的国家发生了战争。这部分是因为民主化往往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个事实(有时候还是极端形式的民族主义)。威尔·胡顿(Will Hutton)相信，“民主国家在国内和国际冲突中都更少表现出脆弱性”。不过，他错了。真相通常正好相反：只有成熟的民主国家在本质上更稳定，处于民主转型中的国家常常需要经过危险的J型曲线。在这个过程中，民主转型国家的内部稳定、甚至作为独立国家的未来都处于危险之中，同时，它们也可能变得比过去更加好战(而不是厌战)。

第二，成熟的自由民主之间没有战争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在与非民主国家或者新兴民主国家交往时不具侵略性。有些学者一致强调民主和平理论有其“黑暗面”，民主国家在面对非民主国家或新兴民主国家时往往更具攻击性。美国在1953年对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领导下的民主伊朗进行的军事冒险，以及20世纪70年代对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民主智利的军事干预表明，民主或者民主的缺乏并不能决定和平还是战争占上风——这远不如说决定因素是某个国家能否达到其强大邻国的期望，或者如果我们谈到全球事务，某国的行为是否符合华盛顿的期待或者属于欧洲大西洋联盟的那些人的期待。最后，即使我们假设所有社会最终都变成了自由民主社会(尽管这种可能性不大)，仍旧会存在对于有限资源的竞争，对于领导地位的竞争，同时仍旧存在能够引发冲突的众多潜在原因。这不仅因为民主化转型中的国家或许会构成严重的安全威胁，



也是因为尝试将无法民主的东西民主化(不管它是在原则上还是在当下，这一点并不重要)的努力能够带来更大的威胁。那些基于民主和平理论之上的现实政策充满了模糊性和缺陷，不仅如此，积极推动自由民主(尤其是通过武力方式)，还充满着其他一些危险。克里斯托弗·霍布森(Christopher Hobson)提出了异常敏锐的观察：“从前的所有庆祝都太早了，但是与民主和平有关的观点很快成为布什政府的‘自由议程’，作为核心辩护和潜在动机，最明确地体现在对伊拉克进行的强制性民主化进程中。民主和平理论不是作为‘和平的力量’，而是变成隐含着造成严重分裂和付出高昂代价的战争。”推行民主和平的尝试确实导致战争，但其后果可能与民主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预测未来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尤其是在预测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时，更是如此。任何大社会计划都变成了一种乌托邦。任何改造社会的激进尝试都产生了与预测的或渴望的结果相反的意外后果。布什政府在中东推广民主的努力受到的最激烈批判来自新保守主义作家安德鲁·萨利文(Andrew Sullivan)，他曾经在 2003 年支持伊拉克战争：“最终的错误是没有足够严肃地对待文化。新保守主义对政府在国内改造文化的能力的怀疑与政府的幼稚之间存在很大差别，尤其是面对外国复杂的、部落的、派别林立的文化时。”真正令人吃惊的是美国政治精英在开始大肆改造外国社会时是多么迅速和毫不犹豫，尤其是与这些精英在解决紧迫的国内议题时的笨拙和拖沓相比时，区别就更加明显。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注意到：

经济学家惊讶于我们的医疗保健领域和多交少得的能力：美国的健康状况比几乎所有其他发达工业国家都更差，但美国人均花费绝对更多，占 GDP 的百分比更高。我们花费在医疗保健上的钱是 GDP 的 1/6，而法国只花费了 1/8。美国的人均花费一直比其他发达工业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 2.5 倍。[3]

与几乎不可能解决的国内医疗保险对比，阿富汗和伊拉克以及大中东的民主化问题似乎容易得多。

那些依靠民主和平理论在世界推广民主的人必须记住康德哲学包含着不使用战争手段作为推动历史变革的手段的观点。康德写道：“但是，不应该尝试通过革命方法提前实现这个观点，也就是通过暴力推翻已经存在的不完美的和腐败的政府。相反，应该通过根据固定原则缓慢改革的方式尝试和推行这个观点。”民主和平理论有助于为若干外国干预辩护。劳伦斯·卡普兰(Lawrence Kaplan)和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的《伊拉克战争》以“民主国家之间发生的战争很少(如果它们之间确实发生战争的话)”这一前提开始，他们的结论是“世界变得越民主，就越亲近美国”。这个结论思维混乱，很难从理



论上得到辩护。事实证明，在某些情况下事实正好相反：一个国家变得越民主，跟随美国跑的意愿就越小。

四、政权更迭和“阿拉伯之春”

西方政治领袖以及与其沆瀣一气的记者和学者在谈论着未来的民主，甚至自由的叙利亚。网球爱好者可能对这些领袖说出网球明星约翰·麦肯罗(John McEnroe)的名言：“你不是当真的。”约书亚·兰蒂斯(Joshua Landis)注意到：“若有人告诉你他们要在叙利亚建造民主，别相信他们的鬼话。”叙利亚的民主建设之所以比其他阿拉伯国家更加困难，除了该国经济发展水平、传统或缺乏传统、民族和宗教派别争斗等因素之外，还有该国人口的平均年龄(21 岁)难题。兰蒂斯提到了华盛顿智库亨利·史汀生中心(the Stimson Centre)的理查德·辛克塔(Richard Cincotta)的研究，此人从年龄结构角度研究了从 1972 年到 1989 年之间不同国家的社会和政治革命，结果发现平均年龄在 30 岁或 30 岁左右(如果超过 35 岁，就没有任何革命了)的国家将很有可能维持其成就。平均年龄越低，民主政权取得成功和持久的困难就越大。在阿拉伯之春中，像在许多其他突出的发展中国家一样，本土性、区域性和全球性因素相互密切地纠缠在一起，只专注于某个方面就可能得出有限的和错误的画面。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强调了地方差异的重要性，当西方尤其是美国观察世界的时候，这种差异常常被忽略。但是，看不到更大的画面同样是错误的。中东事件也需要在世界整体权力平衡的变化背景下被观察。冷战时期，中东是华盛顿和莫斯科争夺优先权的区域，现在的大象是中国，它介入中东事务的程度越来越深。塔里克·拉马丹(Tariq Ramadan)的判断是正确的，他说，“这根本不是对民主价值观的赞美，真正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在非洲和亚洲进行的经济和意识形态战争”和“多样化的激烈竞争的出现已经使西方跨国公司的市场陷入危险之中”。这是阿拉伯觉醒的背景，虽然有区域的和本土的理由，但也存在着决定成功和失败的癖性因素。如果不考虑这个背景就等于盲人摸象。

对于当今政权更迭可能出现的新趋势，人们的判断因人而异，有人忧心忡忡，有人则满怀希望。自政治和国家出现之初，依靠民主投票实现政府和平变革的可能性，一直就存在于奋起反抗当权者的人当中，无论是古罗马的奴隶还是中国、俄国或中世纪欧洲的起义农民或美国、法国和俄国的革命者。而外国援助也决非闻所未闻的稀罕事，无论是帮助政府镇压叛乱(弗拉基米尔·列宁称沙皇俄国是“欧洲的宪兵”，因为它在 19 世纪中期支持保守的欧洲政府)还是帮助反叛者。但是，后联合国宪章时代的国际法禁止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因而，任何资助反叛者的行为就等同于违反国际法。如今，甚至帮助政府镇压叛乱也与国际法相背，因为它违反了民众自决原则。与此同时，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导致



国际人权法的出现和迅速演变，同时不仅将战争罪行而且将种族屠杀和反人类罪变成国际法中的犯罪行为，而且还出现了人道主义干预的概念。

在政权更迭的背景下，我们面临与此趋势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人们奋起反抗没有代表性的政府，尤其是后者通常不拉选票。在全球化的世界，反抗具有传染性；呈现连锁反应的形式。与从前不同，这种连锁反应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所有这些联系和链条不是真实的而是虚拟的，多数联系只存在于脸谱或微博上。一国的反抗者在没有造成重大伤亡的情况下轻易取得成功，另一国的当局却有能力镇压反抗者。决定反抗成功与否的变量太多，最重要的变量是内在而不是外在因素。反抗的结果可能是没有明显的外部参与的兵不血刃的政变(如突尼斯)，也可能是外国明显支持反叛者的相对短暂但血腥的冲突(如利比亚)。但更多的情况是结果难以预料的长期的血腥内战(如叙利亚)。新情况是外国帮助一个国家的反叛者可能鼓励其他国家的反叛者或潜在反叛者。在 2000 年的千禧年报告中，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注意到人道主义干预“可能鼓励分裂主义运动故意挑起事端，激怒政府犯下侵犯人权的行动，以便引起外来干预从而帮助其分裂国家的阴谋”。阿兰·库普曼(Alan Kuperman)称之为“道德危害问题”，对风险的保护刺激人们甘愿冒险。他指出，因为科索沃而威胁对塞尔维亚使用武力的声明使得科索沃解放军胆子更大，鼓励了士兵使用暴力伤害在科索沃的塞尔维亚平民，从而激怒塞族人做出过度反应，招致外国干涉。结果正是如此。同样，那些反对独裁者如利比亚的卡扎菲或叙利亚的阿萨德的人已经使用或正在使用同样的伎俩。

但是，问题在于外人不能帮助所有反叛者，更重要的是，每个国家的国内情形都各有不同，在一个国家奏效的做法在另一个国家完全不起作用。与此同时，外国的支持虽然不足以让反叛者在斗争中占上风，但他们在当局愿意做出让步的情况下仍然拒绝妥协。他们坚决要求现政权下台，只有处决或杀掉领导人及其支持者才能让他们满意。有时候这种策略可能奏效，但往往导致无休止的内战和更多的流血。罗伊·斯图尔特(Rory Stewart)和杰拉尔德·诺斯(Gerald Knaus)写道：“代表国际社会的外国人通常比他们想象的要虚弱得多，他们不可避免地被当地社会孤立，加上不熟悉当地文化和情况，很容易被抽象理论引入歧途。”他们认为：“失败总是可能的，无论多么可怕，它是一种选择。”需要特别强调最后一点——失败是一种选择，因为政客和军人在失败变为现实之前从不相信自己会失败。等到败局已定，人员和资源的重大损失已经无可挽回。

1979 年，里根政府时期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发表了她的著名文章《独裁与双重标准》。该文值得研究不是因为我们一定要赞同她的论证，而是因为它鼓励人们思考各种政策及其意料之外的后果。柯克帕特里克写道：



在所有这些国家中(蒋介石垮台前的中国、卡斯特罗胜利前的古巴、越南战争的某些关键阶段以及最近的安哥拉)，美国促使当地政府实现自由和民主化的努力都遭遇激烈的内部反抗，不仅失败了，而且实际上帮助了新政权的上台，如果与从前的专制政权相比，普通民众享受的自由和个人安全感更少，更糟糕的是，新政权对美国利益和政策采取敌视的态度。[4]

当然，今非昔比。柯克帕特里克鼓吹依靠专制政府与美国结盟来对抗苏联及其盟友。今天，为独裁者提供支持的合理性已经不复存在，但柯克帕特里克的结论仍然符合实际。打击独裁者或推翻独裁政权可能产生预料不到的后果，在新政权下，民众享受的自由和个人安全感更少，新政权对美国利益和政策采取敌视的态度。

注释：

[1]C. Layne, "Kant or Cant: The Myth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2, 12.

[2]R. Suskind, "Faith, Certainty and the Presidency of George W. Bush",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7 October, 2004.

[3]Joseph Stiglitz,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 W. W. North & Co., 2012.

[4]J. J. Kirkpatrick, "Dictatorships & double standards", Commentary, November 1979.

（本文发表于 2012 年 8 月《欧洲杂志》）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9-9 陈家喜：国际干预与民主转型：基于“阿拉伯之春”的经验观察



陈家喜：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

我们常常发现，那些丧失了政治合法性的政权，更容易被外力干预所动摇和左右；而在经济政治危机交织压力下的政权，也更容易被外力左右。在承认国际干预和外部介入成效的同时，必须关注威权体制的内部脆弱性。

”

始于 2011 年初的阿拉伯之春犹如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政治情景剧。先是由街道商贩自焚引发的社会骚乱，在短期内导致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下台，促成了“茉莉花革命”。随后该地区的巴林、沙特阿拉伯、约旦、科威特、阿曼、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以及叙利亚等国，接连出现社会动荡与政治变革。许多观察者将这一系列事件定性为革命、叛乱、暴动，“内生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运动” ，或是缺乏明确组织者和领导者的群氓行动 。然而，还有研究者将阿拉伯之春看成“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前三波相比，这一波浪潮不仅没有越过中东的阿拉伯世界，而且还是以这一区域为中心。 并且，在这一波民主浪潮当中，西方国家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本文试图以民主化的国际因素理论出发，解析国际势力在阿拉伯之春中的干预契机、作用手段、策略选择与实施效果，力图把握国际干预在阿拉伯国家转型中的作用机理，并证明外力干预最终只有转化为内部因素才能够发挥效力。

一、民主化的国际因素理论：文献回顾

与民主转型的结构主义论和精英主义论相比，国际因素理论注重从威权体制的外部视角来认识转型过程。广义上民主化的国际因素理论，是指在国际结构性要素和国际行为体的推动、鼓励和强制作用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民主转型或者过渡的过程；狭义上仅指国际行为体在推动威权体制转型所发挥的突出作用。在上述定义中，国际结构性要素又包括国际政治格局、国际经济秩序、国际文化与社会交往，以及国际意识形态和传播秩序 ；



而国际行为体则包括美、英法德等西方大国，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各种国际援助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

国际干预理论的潜在预设是，对于非自由体制而言，民主可以通过外部影响，被“鼓励”、“塑造”和“支持”，从而实现民主过渡与转型。虽然早期政治现代化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有赖于市场经济与城市化的发展，识字率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中产阶级与市民社会的成长等条件。 但国际因素理论则从中受到启发，它们期翼通过外部援助来孕育民主化的基础条件，推动受援国渐进的民主化进程。也正是在这一乐观主义主导下，二战之后美国积极向“非民主”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经济援助，并附带政治改革的条件，旨在实现美式的“民主输出”。亨廷顿对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观察证实了这一点，美国正是利用其超级大国地位，对于拉美、东亚、东南亚和南非的民主化进程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欧盟也在 1980 年代开展“民主提升与保护”计划(DPP)，旨在推动中东北非的民主转型，以及中东欧的民主巩固。

然而，长期以来，民主化的主导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内因素，不论是结构主义论还是精英主义论，都将民主转型看成是国内政治过程的结果，外部国际因素只是发挥次要、间接、乃至微弱的影响。 并且，国际干预能否对于目标国的民主进程产生积极作用也充满争议。例如研究者发现，西方的经济援助可能诱发受援国出现大量的寻租、腐败以及内战，进而对民主进程产生不利影响。西方援助本意在于推动受援国的市场化改革，却可能孕育一批不劳而获的寻租官员，他们可以大手花钱却不用担心向民众增税。 当政府财政不依赖于民众和商业组织的纳税之后，当政者也就失去了压力和动力去建构民主的回应体制。 大笔的外援还可能导致政局不稳，受援国的各种政治势力，围绕国际援助进行你争我夺的暴力斗争，导致政府的解体。 特别是一些腐败的执政党，为了独占这笔“意外之财”，将极力排斥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加入政府的政策过程，因此政治制度受到破坏，政治分歧显著，民主出现恶化。 因此，西方援助可能会进一步巩固当政者的统治能力以及市民社会的萎缩，或是导致更为严重的政治动荡而非民主。

显然，上述研究主要从宏观上探讨国际因素对于威权体制转型的影响，探讨的是作用方向而非作用机理，并且对于国际干预的认识也局限于经济援助或制裁层面。而实际上，国际干预还有着更为广泛的形式，如军事打击、舆论谴责、价值输送等等，因此国际干预与民主转型的复杂关系需要更为深入的解析与探讨。

二、国际干预在阿拉伯之春中的形态与机理

阿拉伯之春为观察国际因素与民主转型的关系提供了绝佳的窗口。一是干预主体与干预目标之间泾渭分明。实施干预的国际势力主要包括美、英法德等国，以及欧盟和北约组



织；而目标国则被上述国家视为“非民主”的中东阿拉伯国家。二是干预手段十分丰富。与传统政府间的经济援助相比，此次干预的方式更为多元，价值输送、经济制裁、军事干预、援助反对派势力等等纷纷采用。三是干预效果及时呈现。由于这些中东国家在短时间内发生剧变，不同的干预手段及其成效，可以通过国别比较加以观察。

（一）价值推送与执政合法性

通过从外部向目标国进行民主价值的输出，侵蚀执政者的社会基础和执政合法性，是国际干预的常见形式。美国决策层认为，正是由于缺乏民主才导致中东国家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盛行，因此对于这些缺乏民主传统和社会基因的国家，唯有进行民主价值观的外部推送，才能推动这一地区的民主进程。 因此，在“9·11”之后，小布什政府大力推行其“大中东计划”，试图用“民主”改造伊斯兰世界。该计划所涉及的 27 个国家中，巴林、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突尼斯、阿联酋等国均位列其中。而从计划的内容来看，包括为政治选举提供技术帮助，促进议员的国际交流和能力提升；培训女性领导者，提供基层法律援助；支持新闻媒体独立；向从事民主、人权、媒体、妇女组织活动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和专业培训等。 这一计划旨在通过民主、自由、人权等西方政治价值观的传递，以及“民主中坚人士”的培训，慢慢侵蚀了这些国家执政者的合法性。

除了“大中东计划”之外，从 1990 年代中前期，欧美国家在阿拉伯世界启动的“民主促进”计划达 600 多项，这些计划大多经过半自主的民主中介机构加以实施的，内容包括对于潜在意见领袖如政治上活跃的妇女，议员候选人、法官、法学专业学生、记者、教师和非政府组织积极分子加以培训；再通过他（她）们游说政府、要求渐进改革和发展自由，用以刺激来自市民社会的民主“需求”。 而事实上，这一计划的实施为这些阿拉伯国家培养了一批具有“民主意识”的社会精英，他们在接受了西方价值观念的同时，也自然成为现有威权统治的反对者。因此不难理解，接二连三的社会骚乱，让突尼斯总统本.阿里气急败坏地认为，暴力和流血事件由“隐身团伙”策划和指挥，而他们又是“被国外敌对势力收买的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他们散布谣言、歪曲事实、蓄意挑动社会动乱，目的是破坏突尼斯的社会稳定和安宁。

（二）舆论谴责与外交压力

如果说价值输送是一种长期而潜移默化的影响方式，采取外交声明、国际舆论、国际组织呼吁、谴责等舆论谴责，会对目标国形成道义、舆论和外交上的压力，进而导致政治上的变革。根据相关媒体报道，美国使用“惊讶”和“不满”来批评突尼斯政府处理国内骚乱的方式，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指出，我们谴责暴力，突尼斯政府应该尊重人民的和平集会以及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对于利比亚政府镇压反对者的行为，美国总统奥巴马认为



这是“残暴的和令人无法接受的”。针对叙利亚的镇压行为，美国抨击巴萨尔政权“不合法、不道德”，呼吁所有国家放弃支持巴沙尔政权并支持叙利亚政权过渡。对于这些非盟友国家，舆论谴责只是第一步，随着事态的发展与恶化，西方国家往往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如经济制裁和军事干预等。

然而，在对待盟友的内乱上，美国的作用与表现却温和的多，恰好验证了亨廷顿的观点，“就像主教和教皇的公使一样，充当了威权政府与反对派的调停人”。 面对埃及政府镇压民众时，美国总统奥巴马一方面谴责埃及政府的行为，警告埃及如继续以暴力方式镇压反政府示威，将停止对其经济援助。但同时，他又要求“埃及政府和示威者都要谨慎处理，千万不要诉诸暴力。”埃及政府应该顺应人民的意愿，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进行改革，“为了达到这些目标，美国政府决定和埃及政府及人民共同努力。” 必须指出的是，对于盟友来说，这一谴责同样会形成巨大的外交压力。该国领导人会意识到，一旦其主要合法性来源--西方强国的政治支持被抽走之后，他也将随之失去执政的内部正当性。正是在美国的介入下，穆巴拉克在埃及威权统治大体以相对和平的方式结束。

（三）经济制裁与社会危机

经济制裁是较为常见的国际干预形式，具体包括停止经济援助、限制进出口贸易、关闭外贸通道、冻结国家及其领导人海外财产等。面对国际制裁，不同形态的国家所采取的反应也有所差异。一党制国家往往会进一步提高主要支持者的恩惠以获取他们的支持；军人政体则会扩大开支，特别是军事装备以及官兵的工资；相比之下，个人政体则会削减各项支出，提高镇压民众的成本。 虽然经济制裁的效果不及军事干预，但是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也将会重创目标国的经济实力，引发连锁反应，如经济拮据、民众生活困难，社会危机进而出现政局动荡。从制裁的效果来看，单一的经济制裁手段、较短的制裁时间和单方面的制裁，都难以使该手段奏效。

在阿拉伯之春当中，西方国家往往将经济制裁作为舆论谴责和外交手段的升级，并且更常用于敌对国。2011 年 2 月，美国宣布冻结卡扎菲和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及其政府高级官员在美国的所有资产，禁止卡扎菲及利比亚高官访美，冻结美国控制的利比亚政府、中央银行和主权财富基金，禁止美国人和他们进行商业往来。欧盟同时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同年 6 月，美国又宣布对 9 家利比亚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实体实施制裁，包括 3 家银行和 6 家公司列入制裁名单。2011 年 8 月，奥巴马签署总统令对叙利亚实施单方面制裁，内容包括：冻结叙利亚政府在美国权限内的一切资产、停止一切美国对叙利亚的投资、禁止向叙利亚出口油气产品、禁止从叙利亚进口油气产品、禁止一切美国个人与企业与叙利亚政府交易等。随后，美国又宣布制裁叙利亚外长、总统政治和新闻顾问和叙驻黎



巴嫩大使，资产其冻结和禁止商业往来。2012年8月，美国宣布制裁叙利亚国营石油公司。经济制裁使这些国家遭受经济上的重创，外部经济来源被封闭，影响到国内民众的生活水平，进而成为社会危机与动荡的导火索。

（四）军事干预与政权垮台

相对于上述各种手段而言，军事干预既包括给予反对派武器支持、协助军事训练，也包括亲自发动军事打击和武装战争。军事干预往往会带来违反国际法、侵犯主权国家以及人道危机等后果，因此往往是国际干预的最后选项，但却是最有效的手段。在阿拉伯之春中，西方国家使用军事干预也十分谨慎。从目前来看，除了利比亚以及美国扬言军事打击叙利亚之外，其他几个国家均未使用军事干预。

而之所以对于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也为形势所迫的策略。由于该国反对力量太过弱小，无法独立推翻现有政权；同时对于利比亚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西方国家难以通过内部渗入的方式培养出自己的代理人。因此，西方国家借助于利比亚的部落矛盾，并辅之以军事行动，来推翻卡扎菲政权。由于利比亚曾属于法国的殖民地，并且法国在当地仍然拥有巨大的投资利益，因而法国担当了军事打击利比亚的急先锋。2011年3月，以法国为首的北约军队，发起了实施“奥德赛黎明”行动，向利比亚发射导弹袭击；在随后的5个月内，北约配合利比亚的反对派武装进行了多轮空袭，最终帮助其控制了政权。军事打击的成本十分高昂，据报道，北约维持在利比亚禁飞区上空巡逻的每周支出达1亿到3亿美元。从2011年3月19日至21日对利比亚的3天轰炸，花费就达7100万美元。在持续3个月的战争中法国军事打持击利比亚已花费1.6亿欧元。

三、国际干预因素的内部转化与影响

显然，对于国际干预对于目标国解体的影响考察，任何单因论都可能陷入掩耳盗铃的解释困境。我们常常发现，那些丧失了政治合法性的政权，更容易被外力干预所动摇和左右；而在经济政治危机交织压力下的政权，也更容易被外力左右。在承认国际干预和外部介入成效的同时，必须关注威权体制的内部脆弱性。在阿拉伯之春中，西方国家所采取的干预手段与成效的差异，可以通过对这些国家内部因素的考察，如政治合法性的降低、社会危机恶化以及自身实力的弱小等因素来加以解释。

（一）政体合法性的减损

政体合法性体现在民主制度的建构程度、政治选举的真实性和广泛性、政治自由的保障程度等，最终落实到公众对于当政者统治的认同度。政体合法性低的国家，不仅遭致国内反对派的不满和抗争，也会给国际干预提供良好的契机。阿拉伯之春中的各国，世袭制、家族政治、裙带关系盛行，政治制度化水平低，政治合法性先天不足，造成抵御外部



干预的能力十分脆弱。特别是在信息化背景下，西方政治价值观的渗透，领袖和高层负面新闻在新媒体上的曝光和扩散，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威权政体合法性的流失。

根据美国学者葛迪思研究，威权体制大体上可以分为个人政体、一党制和军人政权三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威权体制的稳定性也有所差异。 阿拉伯之春的突尼斯、也门、埃及等五国政体带有混合型政体的特征，融合了强人政治、一党制和军人政权的三重特性。在上述五国中，突尼斯总统本·阿里（执政 24 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执政 30 年）、也门总统萨利赫（执政 33 年）、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执政 42 年），都是长期专权的政治强人。执政时长最短的者是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于 2000 年从执政 29 年的父亲手上接过权柄执政至今。此外，这些国家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子承父业”的世袭色彩。除了叙利亚之外，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让其子贾迈勒担任该国执政党--民族民主党的副总书记兼政策委员会主席，便于接掌总统职位。2011 年 1 月，也门国会修改宪法取消总统任期限制，总统阿里·萨利赫有意把职位让与其子艾哈迈德·萨利赫，后者担任该国特种部队和国民卫队司令。此外，卡扎菲的长子、五子和七子也分别在利比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部门担任要职。尽管这些政权都有一个带有装点门面式的政党，如埃及民族民主党、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和叙利亚阿拉伯复兴党、也门全民人民大会党以及叙利亚复兴党。然而，由于这些威权领袖通过家族政治、军队、伊斯兰教和政党，掌控着政治选举和国家权力，使政党的功能受到极大限制。因此，这些弱合法性的政权，在面对西方的舆论压力，外交攻势和军事打击时，不仅获得国内民众支持甚少，而且还出现执政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政府高官和军事将领纷纷叛逃，再次证实这一体制的脆弱性。

（二）社会经济危机的恶化

国内社会经济危机的生成与恶化是国际干预的重要契机。经济危机表现为经济发展滞后，通货膨胀严重，贫富差距悬殊，失业率高等；社会危机体现在社会结构失衡，精英与民众之间，教派与教派之间，部族与部族之间的严重割裂和断层生成。面对多重外部干预，如军事打击、经济制裁、援助控制、内部战争以及出口控制，拥有高度的经济绩效能够确保威权统治更加稳固，而低迷的经济增长会同外力干预相互作用和发酵，导致独裁者的下台。

阿拉伯之春中的国家内部社会经济问题丛生，导致社会骚乱与政治动荡，不仅形成内部的体制脆弱性，对外部干预的抵抗力大为降低。如利比亚依靠石油资源保持较高的经济绩效，2009 年人均 GDP 即达 9000 多美元，但获益群体却十分有限，动荡前的利比亚失业率高达 21%。卡扎菲将巨大的石油收益用于购买武器和中饱私囊，其家族掌控着国家的经济命脉以及该国 700 多亿美元的海外资产。与此相似，埃及富人集团在全国人口的 20%，



却拥有 55%的社会财富；占全国人口 60%的穷人，只拥有 18%的社会财富。也门 10%的富有阶层控制了 34%的国民收入，其消费总量占全国总消费量的 25.5%，而 10%的赤贫阶层消费仅占全国总消费量的 3.5%。相对于以上国家，突尼斯的发展指标在中东国家屈指可数，2009-2010 年度世界经济竞争力论坛年报显示，突尼斯在 133 个国家排名中名列非洲第 1，世界第 40 位。然而，伴随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啸”，突尼斯经济滑坡，外企大量裁员，失业率急剧上升。与此同时，本•阿里家族成员的严重腐败开始曝光和散播，进而引发社会的大动荡。

（三）国家能力与盟友关系

影响外部干预的第三个因素是国家自身实力的强弱及其盟友关系。通常情况下，一个超级大国除了自身出现问题，他国很难加以撼动，特别是采取最为直接的严厉制裁或者军事介入手段，而这两种手段在西方国家用于推翻小国时立竿见影。如冷战时期，尽管西方阵营对于苏联及其所领导的华约敌视有加，但却没有采取军事手段来加以变革。而在此次阿拉伯之春当中仍然坚挺的叙利亚，显然一旦离开俄罗斯的庇佑和保护，可能会迅速沦为又一个利比亚，其在西方国家的直接军事干预下，将会不堪一击而迅速解体。

盟友关系也决定着西方国家干预的形式及其程度。实际上，在阿拉伯之春的国家当中，埃及、也门、巴林等均为亲西方的政权。埃及在 1990 年代曾经是美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国家之一，作为美国在中东的代理人，埃及积极协助美国调停区域内的冲突与争端，因此穆巴拉克长期的威权统治与美国的支持也不无关系。也门和巴林是美国反恐的重要伙伴，巴林还是美军第五舰队司令部所在地。因此，虽然上述三国带有威权体制的色彩，甚至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但西方国家仍主要集中在相对平和的外交方式，协调当权派与反对派和平解决争端。甚至在 2011 年 2 月巴林发生社会抗争时，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仍前往该国访问以示支持当政者。此后，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半岛之盾”部队进入巴林，镇压示威者，协助巴林“维护正处于危险之中的国家安全和秩序”，美国却置若罔闻。 为此，英国广播公司网站发表题为“为什么美国支持对利比亚而非巴林和也门动武？”一文，对此提出疑问。反观利比亚和叙利亚，美国及其盟友则态度十分鲜明，明确要求当权者下台，否则将进行严厉的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

结 论

伴随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到来，各国之间的影响与互动日趋增加，国际结构性要素和国际行为体对于威权国家民主进程的影响也不断加强，民主转型的国际因素理论开始拥有越来越多的经验支撑。在阿拉伯之春当中，国际行为体在推动国家政权更迭和转型中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用，除了兜售民主价值之外，还综合使用了舆论谴责、经济制裁和军事干预



等各种手段。而从干预的时机来看，西方国家除了一贯坚持的“政治信念”和“民主价值”之外，更主要的是利用了这些阿拉伯国家自身出现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这些中东北非国家长期实行合法性极低的个人政体，政治合法性低；经济危机与通货膨胀严重，失业率攀升；社会分化加剧，贫富分化突出，民众相对剥夺感强烈。

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对于民主转型的影响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无法截然割裂开来。从阿拉伯之春来看，外部的压力、渗透、扩散、干预，与内部结构要素和行动者的结合，最终在目标国“内部发酵”，产生民主化的综合效应。如西方的价值推动不是简单地推销政治价值观，而是通过改变民众的政治观念和培养独立的意见领袖，达到污化丑化当政者的目的；经济制裁不过是在目标国已经岌岌可危的经济危机上再撒把盐，激化民众与当权者之间的矛盾；外部援助和军事干预也多是应国内反对派的需求而实施的。因此，归根结底，中东的政治变局，是由于这些中东北非国家自身矛盾重重，导致外力变内力，内外力交集，最终出现政权更迭或动荡。从这一点来看，在民主化的经典理论体系当中，国际因素理论无法与结构主义理论和精英主义理论截然区分开来，它们很多情况下存在着交叉和互动的复杂关系。

（注释略）

（本文发表于《国外社会科学》2013 年第 4 期）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主编：方可成

编辑：王陶陶

设计： 潘雯怡，张宇星，常仁豪

校订：施钰涵

出品人：杜婷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请发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若订阅 pdf 版请发送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mobi 版至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epub 版至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是在香港注册的非牟利团体，论坛理事杜婷、梁文道、闾丘露薇、周保松。除了一五一十周刊之外，Co-China 每月还在香港举办论坛，并透过网络进行视频、音频和文字直播。2012 年开始 Co-China 在香港举办面向青年的夏令营，第一届主题为「知识青年，公共参与」，2013 年夏令营的主题是「始于本土：本土、国家、世界冲撞与协商」。

Co-China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co

Co-China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weibo.com/1510weekly）

Co-China 论坛 facebook：「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https://www.facebook.com/CoChinaOnline）

